



火红的金达莱

——“文革”中下放延边农村纪事

帅雪晓 著

天地出版社

火红的金达菜

——“文革”中下放延边农村纪事

帅雪晓 著



天地出版社

2002年·成都



作者夫妇近影



2001年9月重访新化村



地处长白山麓的新化七队



美丽富饶的延边农村



风雷震颤，风雨芳菲

——《火红的金达莱》序

王 火

往事已然苍老，但历史不能忘却。

早有人说过：“文革”貌似一场正剧，其实是一场悲剧和闹剧。《火红的金达莱》，是一个极好的共产党员和他的妻子（也是共产党员）在“文革”期间及以后的遭遇的叙述。这里充满了帅雪晓同志及其夫人卢爱忱同志的喜怒哀乐，这里是他们一段刻骨铭心的难忘记忆，一段正常人在正常年代少有的经历，一段事后滤沉多年冷静下来

的思索，一段富于人格力量的回顾与总结。对于我这样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读了以后，对那场毫无历史必然性的毁灭文明、毁灭生命的愚昧与“混战”，仍不免感到心跳引发共鸣，有一种风雷震撼之感。原因在于其内容及思想感情的真实及新鲜，它勾起我对往事的回想，也挑起我的兴趣，在本书的叙述中因其独特而使我沉思。

本来，每个人的经历及心路历程，其实都可以写成一部各不相同的作品。因为各人的经历绝不会完全一样，各人的想法与体会更不会完全相同。《火红的金达莱》写的是荒谬年代中的一首悲欢交响曲。我经历过“文革”，并出版过《在“忠”字旗下跳舞》一书，但雪晓同志写的这部书，我既熟悉又生疏。熟悉的是“文革”中遭迫害、诬陷、批斗的那一些，生疏的是他们夫妇发配边疆流放长白山麓务农四五载的劳动、生活与见闻。这段生活不乏生死考验、艰苦崎岖，却居然也不乏诗情画意、田园景色。这对我来说，读时颇获风雨芳菲的意境，这自然就是一种新鲜感了！

我查找地图，在吉林省地图上找到了属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县（现在是龙井市），又大致找到了原来光新公社新化大队所处的地

点。呀！那真是长白山区一个太遥远带点神秘的地点。那里离朝鲜的边界多么近！这是个春天开满红色的金达莱而冬天布满漫山遍野深厚大雪的地方。他们夫妇在那里语言不通、生活习惯迥异，人地生疏，两手空空，但像《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翁那样仰赖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及毅力，寻找生存和改善生活的权利。他们制爬犁、当“猪司令”、插秧、积肥、改土造田、整理打石场、搞水利建设、收割水稻、抗早点种、挑水上山、伐柴、狩猎、做“养鸡养鸭专家”……因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念而韧性地生活下来。看看两个共产党员的这段戴着屈辱帽子的生活，背后可以得到的思索与回味很多很多。在养猪时，作者说：“和猪们在一起，我有莫大的欢乐，更有安全感。”在被邀约去帮助县里出去做外调工作时，作者说：“一个等待落实政策的现行反革命，却去为落实别人的政策努力创造条件并参加对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滑稽之至！”……类似这种事实与感叹，更足以看到“史无前例”的荒唐与荒谬。幽默的话透着辛酸，反常的事有着苦恼人的笑叹。

我在前边说起过人格力量的话，帅雪晓同志夫妇本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可是“文革”一

来，红白颠倒，竟成了“现行反革命”，甚至开除党籍。于是就受到了种种非人摧残。可贵的是在逆境中，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奋斗去赋予生命意义，像一位哲人所说的：“生命在闪光中见出灿烂，在痛苦中见出真诚。”他们干一行学一行，在生死存亡之间，依然在为党为人民为共和国做好事。他们反对“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的事，因此蒙冤招祸，可是他们流放到冰天雪地之中，依然注意民族团结，搞好知青教育，甚至因当地盛行酗酒之风，会喝酒的老师居然五年中极少同社员一起喝酒，还带动了男人们干家务……他们既不忘掉党员、干部应有的责任感，也不抛弃时代赋予的使命感，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正气凛凛，我行我素。那种处境下做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外国人我想可能难以理解，生活在今天改革开放好时代的年轻人怕也不易明白。他们的表现说明：好党员就是这样，放到哪里都会放光，在人民中间就像革命的种子。“文革”末期国家元气大伤，但“四人帮”覆灭，党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国家恢复得很快，靠的自然是无数百折不挠的好党员和好干部起了中坚作用。《火红的金达莱》也许可以曲折地反映、印证这一点。

《火红的金达莱》，可贵在于真实。它写了“文革”，但又并不是一本专写“伤痕”的书。它用很少的篇幅涉及“文革”里的那种批斗、殴打……而用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写了干部下放当农民的生活，写了一对党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后依然挺拔的故事。这是特色之一。在写这段生活和故事时，又不是用悽悽惨惨、悲悲哀哀的心愿与笔法来写，而是用一个共产党员的笔墨抒发站在今天、回顾过去、瞻望未来且对未来中国怀抱信心的胸臆，表现出了拳拳的赤子之心，不乏乐观主义与豪情壮志，这自然是特色之二。

“文革”早已是历史。帅雪晓同志的文稿有其特色，就有其价值。有同志曾倡议建立“文革学”。无须建立或不建立，若干年后，研究历史的人，如果看到《火红的金达莱》一书，那将可能会像获得一种珍贵的参考资料来对待。

写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忽然想起林则徐被充军新疆时所吟的诗了！诗中有两句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啊！“往事多历历，漫说等云烟”。风雷震撼！风雨芳菲！……

2002年1月2日于成都



读后随想

我只去过“五七”干校，时间也短，且在农闲，秋收早已过去，春播尚未开始，做了一些修房补屋的活路，委实比较清闲。学习却抓得很紧，上头发下了话：大家要作安身立命的准备。“五七”干校只是一个过渡，到时得插队落户，跟社员一样凭工分吃饭，工资早晚是要取消的。这话一出，清闲的活路换不来清闲的心境了。记得有一位编辑未雨先绸，常去驻地生产队长家串门，跟队长待字闺中的妹子套

近乎，爱慕是假，替日后找一个落脚点才是真。于此也可看到悲剧上演前的闹剧了。

读雪晓同志“文革”中下放延边的农村纪事，我情不自禁地就想到了上边说的那段日子。通过恋爱寻求落脚点的不多，似乎仅此一人。可瞻望前程，今生为何落脚的氛围，在岁末年初的寒冷里，却平地刮起又一股西北风，堵得大家心里难受。真个要作安身立命的准备了！会上会下，议论纷纷，一片叹息。这身如何安？吃的，喝的，住的，往后就靠挣工分，行吗？这命如何立？学文的，学工的，学理的；做编辑的，当作家的，搞艺术的，往后就在田间地头和白云苍狗间了此一生么？

当时冒出的问题很多，今天又有了大抵相同的答案，答案就写在雪晓《火红的金达莱》，即下放延边的农村纪事里。雪晓夫妇在延边农村做了五年农民，有辛酸，有苦涩，也有慰藉；他经历的，有闹剧，有悲剧，也有喜剧。如他所说，这段沧桑岁月，是他人生历程中永难抹掉的一页，而彼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为，甚至被他看做是寻觅人间正道的必经之路。

什么是人间正道？我理解不是高官厚禄，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如何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雪晓出自一个革命家庭，建国后苦尽甜

来，他前程似锦，发展自然很顺利。“文革”一声炮响，什么都颠而倒之了，他又不善唯喏，相反敢于直言，本来世事坎坷，他的秉性于是决定他去农村时还有一个戴罪之身，戴着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可他的正义和良知并未受制于背负的十字架，毫未扭曲，毫未减损，他自己信任自己，帅雪晓还是帅雪晓，该怎么样做人还是怎么样做人，该怎么样行事还是怎么样行事。

我们看到的，是他和他的妻子，在万难的逆境和艰苦的生活与劳动环境中，相互砥砺，赤子之心不泯。对身旁的下乡知识青年视若子侄，关心他们教诲他们；与朝鲜族的邻里相处，或老或幼，如父如兄，情谊深厚，交往十分感人。而在适应和处理生活与生产的同时，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智慧的脑子，养鸡饲鸭，抱蛋孵雏，种种困难却像溪水般流淌，安然而有序，并且成绩斐然。作品里附有一篇雪晓夫人记述当猪司令的文字，写于当时，幽默谐趣，于中可以见识这个女人的聪明才智，同时不能不佩服在那样的境遇里她依然能够保持一种只有童心常在的人才有的乐观。

这段沧桑岁月，对于雪晓和他的夫人，是检验，是考验，是磨验，是锻炼。横竖是个

“验”，验明正身的“验”。这就验出来了，什么修正主义，什么反革命，统统扯蛋，夫妻二人走的是一条人间正道，做的是堂堂正正的人！

至于说这段桑沧就是寻觅人间正道的必经之路，我却不敢苟同。条条道路通罗马，何必去农村呆五年呢？加上“五年”之前之后的“文革”日子就是十年，再加上“十年”之后那些年的莫须有的折腾，差不多就是整整一个时代。整整一个时代呵！一个文化悠久的民族得做多少事，走多少路，却在凄风苦雨里黯然神伤、立马不前，罪过，罪过，真乃罪过！当然，帅雪晓的“必经之路”，是就他个人的情况而言，且在这话前边加上“也许”，也许这是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吧。

“五七”干校也罢，插队落户也罢，咄咄怪事已经很遥远了。然而人生难免不糊涂。大的糊涂账了结了，谁能担保就不会出现小糊涂账呢？雪晓的下放记事，尚涉及讲真话吐实情等问题，所包容的其实已经超出了“下放”。纪事不同于历史，攀不上以史为鉴，立此存照吧，存照也是有价值的。

雪晓同志嘱我读其作品后写一篇序。我不善于此类文字，拉拉杂杂，随意性强，唤做

《读后随想》，聊以奉出。固然不登大雅，于我却勉为其难了。

宇 心

2001年12月9日

一段记录文革风云的历史注事
一首体现团结友爱的民族赞歌
一出饱含离合悲欢的人间正剧
一番喷涌痛定思痛的内心剖白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渺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鲁迅

目 录

- 1 引 言 (1)
- 2 祸从口出 (3)
- 3 “牛棚”春秋 (16)
- 4 发配边疆 (28)
- 5 躬耕垅亩 (37)
- 6 放猪生涯 (49)
- 7 打柴活路 (55)
- 8 鸡鸭成群 (61)



| | | |
|----|--------------|---------|
| 9 | 知青风波 | (66) |
| 10 | “五七”难友 | (72) |
| 11 | 狩猎见闻 | (82) |
| 12 | 洪灾余生 | (88) |
| 13 | 为人作嫁 | (93) |
| 14 | 民族情深 | (102) |
| 15 | 黎明之前 | (111) |
| 16 | 西天“取经” | (120) |
| 17 | 重见天日 | (129) |
| 18 | 替父申冤 | (138) |
| 19 | 归去来兮 | (152) |
| 20 | 情满天池 | (159) |
| 21 | 红花似火 | (167) |
| 22 | 后 记 | (174) |

1 引 言

多年前的往事，回忆起来难免有几多辛酸苦涩，但从结局来看也不无一丝慰藉。说它是笑料，我却无论如何笑不起来；说它是悲剧，可悲与喜向来就不断易位，寓喜于悲。惟一能够肯定的是：它是我人生历程中无法回避和永难抹掉的一页。历史，掺不得半点假，不容歪曲，不许忘怀。现在，就来讲述我三十年前一段饱和着血与泪、悲与喜的沧桑岁月，彼时所见所闻所思



所为。也许，这是我寻觅人间正道必经之路。



祸从口出

故事发生在那个不堪回首的疯狂年代。

1969年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经过“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大串联和武斗之后，军工宣传队进驻上层领域收拾混乱局面，引导“革命造反派”实现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随即开展声势浩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据说这也是“伟大战略部署”。一时气氛高度紧

张，凡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犯过错误，或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都惴惴不安，人人自危。

当时我和妻子卢爱忱都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大学工作。“文革”前我任学校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因一直从事党务工作，“文革”开始后又抽调到市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办学路线”，故在劫难逃，受到冲击，被造反的学生揪回学校，先是“勒令”我揭发、交待问题，继之则成为揪斗、专政的对象，被“打翻在地”，还被“踏上一只脚”。

事情还得从“文革”开始说起。

1966年夏，一批北大、清华的红卫兵来长春“传经送宝”，批评长春各大学造反的声势不大，“过于温良恭俭让”，并作揪斗干部的示范，在长春地质学院门前广场召开全市大会，斗争、殴打了该院副院长彭山。很快，各校就掀起了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高潮。

8月的一天，我所在学校的学生第一次揪斗“卖力执行修正主义办学路线”的副院长济舟，我和部分中层干部陪斗。斗争会开始，学生给被斗、陪斗者戴高帽。这种高帽是用厕所

装手纸的铁丝篓糊上纸制成，给济副院长特制的那顶近一米高，其余的稍矮，以示区别。上来一帮气势汹汹的学生和总务处工人，分别给我们往头上戴。别人虽不情愿，但都半推半就地被戴上了。惟独我抗拒不戴，将扣在我头上的高帽抓下来扔在一边，又有人强行给我戴上。这下我怒从心上起，扯下高帽一脚踩扁，并飞起一脚将这顶高帽踢得老远。我的反抗行动，立刻引起巨大反响，会场顿时乱了套，有人高喊“打倒帅雪峯”！有人则针锋相对地呼叫“要文斗不要武斗”！真是泾渭分明，从此学校形成了两派。对我这次大闹会场的举动，事后反映不一，有些人称我“有骨气”，有些人则说我“不该同革命小将顶撞”。我自己则有种自豪感，觉得对如此侮辱人格的行为应予抗争。

几天后，又召开全校大会斗争党委副书记李品三。这次我学聪明了，认为学生们年轻幼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愿望是好的，行为过火可以理解。如再继续对抗下去，吃亏的只会是自己。所以，上台陪斗时再未进行反抗。我同武装部长刘学增一左一右跪在李的旁边，任凭学生给我们戴高帽、涂花脸、剃“阴阳头”。不过这次陪斗，我还要

了点小聪明：事前知道会被揪上去陪斗，罚跪在所难免，于是在双膝上套了一付打排球用的护膝，被长裤一遮，谁也看不见，结果收效明显，少吃了不少苦头。斗争会结束后，李、刘二人的双膝已经发紫，疼痛无比，走路都困难，而我的膝盖只是红了一点，并无大碍。当然，我这种“不老实”的行为若被造反派发现，将会吃更大的苦头。

这次陪斗的当晚，我被禁止回家，送到“群众专政办公室”看管起来。家也被抄了，用白缎精致裱装的一帧太平天国天王玉玺印模真迹和两副名书法家写的对联被抄走，事后无法追回。一年来，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批斗会，已真正被“斗倒斗臭”，马上又要面临“清理阶级队伍”更严峻的考验。

“清队”开始时，军、工宣传队向我们这批被关押的“专政对象”训话，要大家“竹筒倒豆子”，“老老实实交待罪行”，并集体收听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光机所）召开坦白交待大会的实况转播。该所包括王大衡在内的一大批有名的专家学者，建国以来全所科研成果累累。在这次大会上，有人揭发说该所是个“特务窝子”，科研人员几乎全是美、英、德、日、苏和台湾派来长期潜

伏的“老特务”，或被派遣特务发展的“新特务”。也有人当场上台“坦白”自己的“罪行”。听后令人既吃惊，又将信将疑。

光机所的“清队”经验，得到省革委会的肯定和推广，全省掀起了抓“特务”、揪“国民党”、挖“反革命”的高潮，该所革委会主任、军宣队长单奎章也因此名声大噪。当然，此人因疯狂迫害知识分子，造成光机所上百人蒙冤，二三十人被迫害致死的惨痛后果，在粉碎“四人帮”后理所当然地受到清算，他和他的主子省革委会主任、某军政委王××一道被开除党籍军籍。此是后话。

听完训话和实况转播，我们这帮关押在群专的“牛鬼蛇神”被命令回原部门同革命群众一道参加“清队”。实际上，这些被揪斗过的人名是“死老虎”，实为“活靶子”，这场灾难看来是躲不过去了。我回到了政治部学习班，晚上被允许回家。几月不见，妻消瘦了许多，她也在所在部门的“清队”学习班接受审查。

某日，政治部学习班开大会，会场设在一间教室，黑板上的大字赫然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当时我在想，应该还有两句造反派经常叫喊的口号“死了喂狗，狗也不吃”，为什么不一起写上呢？

正在遐想，忽听主持会议的工宣队员一声断喝：“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帅雪峯揪出来！”这一喊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心想自己的问题怎么又升级了，在“修正主义苗子”、“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保皇派的黑后台”之外，又多了一顶新帽子！

此时立即有两个特意布置坐在我左右的造反派拧着我的胳膊将我揪上台，面对群众低头弯腰。随即，有几名“幡然醒悟”者上台揭发我“执行修正主义办学路线”、“镇压革命小将”、“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最后军、工宣传队宣布对我实行“隔离审查”。

我的新“罪行”，是在这次“清队”中被揭发出来的，说我们夫妇与另一些人“组成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散布了大量反革命言论”。我回忆了一下，“文革”开始后，由于对无端随意揪斗大批干部存有不同看法，因而怀疑、不满运动中相继发生的一些恶性事件，的确同一些观点相同的人交谈过，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同情受冲击者，为他们鸣不平。如认为朱德功高；贺龙对革命忠诚；彭德怀是我军

数一数二的战将；刘少奇任党的二把手、邓小平身居总书记都是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的；彭罗陆杨长期在中央担任要职；杨成武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消灭了被日军誉为“名将之花”的阿部规秀；肖华 18 岁就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这些同志不可能反党，评价人应公正，要一分为二，功过分明，不应该过河拆桥。

二是对造神运动反感，反对个人崇拜。对于搞“红海洋”、跳“忠字舞”、唱“语录歌”大不以为然，认为形而上学的东西过多过滥，正如陆定一所说是简单化、庸俗化。尤其反对喊“万寿无疆”，认为这与封建社会臣子对皇帝三呼九叩无甚区别，共产党人可以歌颂党歌颂领袖，但领袖不该接受“万岁”之类的欢呼，应警惕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危害。

三是怀疑林彪、江青等人的动机，厌恶其恶劣表演。林彪解放后一直不工作，逃避抗美援朝，“文革”一来病突然好了，步步“紧跟照办”，说了许多“三忠于四无限”之类肉麻的话，其“顶峰论”不符合辩证法，动机可疑。特别讨厌江青，她到处“代表”，煽风点火，胡言乱语，惟恐天下不乱，提倡“文攻武卫”导致武斗升级，其表演令人恶心，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1969年中秋，我还写过一篇散文《中秋的哀愁》，这更是我“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现实恶毒攻击”的“铁证”。现照录如下：

一年一度的中秋又降临人间。

八月十五的月亮分外明，她不仅带来嫦娥奔月、玉兔捣药、吴刚伐树等许多引人入胜的神话，振奋我们民族恢宏中华的大无畏精神，而且也象征着丰收和团圆。因此，每逢中秋佳节，总会有亲友团聚，赏月，饮酒，品尝月饼之举。中秋之夜，那皎皎月儿浮悬天际，银光四泻，皎洁无瑕，若逢五彩绚丽的月华出现则更是美不胜收。当此之时，尝几块月饼，饮数杯好酒，邀友赏月，其乐何如！

而今呢，却另是一番景象。

月饼，去商店问过，售货员用手指指那空空如也的货架，不耐烦地回答：“没货！”尽管如此，商店仍然拥挤不堪，希望买月饼的人们还是徘徊不去，希冀能买到几块哪怕是普通白糖馅的也好。直到商店下班的铃声响了，连月饼气味也没闻到的人们才怅然离去。有什么办法呢，食品

厂的工人早就不敢上班了，他们怕碰上满城横飞的枪弹。那些拎着空篮子回家的父母，只好对双泪欲滴的孩子们诳道：“明年买个大的，一定让你们吃个够。”月饼，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秋之夜美酒、佳肴、好友缺一不可，而今却三者皆不可得。

酒有一点，但非美酒，乃是淡而无味的50度白干。本省特产通化葡萄酒，已久不见踪影。

佳肴，更属痴心妄想。市面上极难有肉类出售，罐头早已脱销，就连平日那种贱得每罐只卖1角5分钱而且很少有人问津的酸黄瓜也早被抢购一空。

至于朋友，则早在一年前乌云翻滚，本人落难之时起，就或疏淡，或不再来往。常言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有些平时看似莫逆的朋友，想不到当你倒霉时，他会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反戈一击”，必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此等危险人物，切切不可再交！

社会秩序也乱不可言。“文攻武卫”愈演愈烈，由拳头而棍棒，而刀枪，而现

代化武器。全城血雨腥风，刀光剑影。两派已经杀红了眼，“血洗”事件不断发生。那些全身披挂、手持钢枪的英雄好汉们，在“取缔黑市”的幌子下，竟敢白昼行抢，将自由市场的猪肉、蔬菜洗劫一空，扬长而去，赤手空拳的小贩敢奈他何？小偷、强盗也多得出奇，由小偷小摸发展到打家劫舍，奸污妇女、谋财害命时有所闻，出现了路断人稀的景象，恐怖气氛弥漫春城。

想到此，闷酒也只勉强喝了半杯。

赏月，更无此心情。推开窗来，枪炮声不绝于耳，天真幼稚的“革命小将”们正互相厮杀，许多年轻生命在不断消失，真令人怵目惊心，肝肠寸断。秋风萧瑟，一派悲凉，连月亮也羞得躲进了云层，不忍睹此惨剧。天乎，为何降此灾难于人间！

面对这冷酷无情的现实，思虑这令人忧心的场景，不禁悲从中来。想我流落异乡，父患重病，兄弟远离，妻女南去，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罪人”待罪北国黄龙，一年来同众多难友一起饱尝了政治上的打击迫害，经济上的克扣剥夺，肉体上

的肆意摧残，和人格上的欺凌侮辱，思之不禁怆然涕下。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求之有？曰：一轮明月，一杯美酒，一块月饼，一位知音，足矣。

呜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967年中秋夜阑人静之时，于长春

这些极具针对性、敏感性的言论和文章无疑是同当时的运动唱反调，自然属于“大不敬”，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其实这些话，是对几个看法相近的人所谈，谁知有人在当时压力下“反戈”一击，将我“击杀”。

挖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是学校一大新闻，在全市也具有相当的知名度。从而更加证明“清队”之必要，于是再次掀起了“打倒”、“声讨”的大字报高潮，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对于所有自己确曾说过话，我全部承认，致使审查我的专案组工作进展相当顺利，不久就写出了书面结论。很快召开党支部大会，宣布开除我的党籍。事关个人政治生命，对我来说应该是很痛苦的事，然而那时我的神经似乎已经麻木了，连眼泪都没有掉一滴，觉

得这简直是一场闹剧，把党和国家搞得乱成一团，这样随便处理党员能作数吗？几天以后，学校整党领导小组决定：“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帅雪晓清除出党。”1970年1月初又召开全校大会，由校革委会宣布对我的最后处理：经报请长春市革委会保卫部批准，将我定为现行反革命（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清除出党，降四级工资，监督劳动。组织处理抓得如此之紧，真可谓一气呵成。

不过顺便说一句，作为整党领导小组，其成员竟包括不是党员的造反派代表在内，这样的大杂烩组织何来合法性？校革委会和市革委会保卫部，有什么权利对党员进行党内处分？是谁在破坏党纪法纪？1979年3月21日在宣布为我平反、恢复我的党籍时，我曾公开声明：我本来就没有被开除党籍，因为那个批准开除我党籍的整党领导小组原本是个不伦不类的组织，市革委会保卫部更不能代表党，因而它们做出的对我处理的决定完全属于非法！

与此同时，爱忱也因“恶攻”罪被开除党籍。临时党支部书记秦某拿着由他起草的支部决议要她签字，其中有“永远开除出党”一句。爱忱质问他：“支部大会上并无人提过‘永远’，你为何擅自加上？”拒绝签字。秦无

奈，只好悻悻地把“永远”二字勾掉。想不到身处逆境的她，竟敢同造反派书记作必要的斗争，而且富有成效。伟哉，爱忱！



“牛棚”春秋

处理完毕，我被再次交到“群专”管理，第二次失去自由，每天仍同“黑帮”们一道接受批斗或参加劳动。

批斗已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大会批，小会斗，我已记不清自己被批斗和陪斗多少次了。罚跪、“坐喷气式”、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拳打脚踢成了例行必修课。“黑帮分子”还不时受到红卫兵的鞭笞，致使不少人整天鼻青脸肿，有几位“民愤极大”、“认罪态度不

好”者甚至体无完肤。

红卫兵不离手的“鞭”其实是种刑具，里面是钢丝芯，外面裹以胶皮管，外软内硬，又有弹性，打在身上其痛无比，极易伤及筋骨。“文革”中革命小将们的这一大发明，本人在一次被批斗时曾“享用”过。当时正“坐”着“喷气式”，被革命小将用这种钢鞭在背上狠命一击，疼得我禁不住失声叫了起来。事后请同室难友高世昌教授查看一下我的背部，他惊讶地说：“哎呀，半尺多长一道血印，肿得挺高。”

1968年初夏，由军工宣传队主持召开了一次“送瘟神”大会，专门批斗“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主席台下面铺着画了×的刘的丝织像，二十几名“黑帮”站在刘的像前陪斗。几名造反派上台发言，历数刘的“罪行”，然后宣布“送瘟神”，将刘的丝织像拿到室外浇上汽油以火焚之，当火焰升起时“革命师生”发出一阵欢呼。

送完“大瘟神”，再送“小瘟神”。命令“黑帮”们统统爬上早已准备好的一辆贴有“送瘟神”字样的大卡车，每人胸前也都挂有写着罪名和姓名的木制黑牌。因为汽车装不下那么多“黑帮”，便命令包括我在内的几名

“黑帮”下车。此车载着一千人犯由几名红卫兵押送到十几公里外的郊区火葬场，训斥一通后，红卫兵们先走了，却叫他们必须规规矩矩地原路走回“群专”报到，路上黑牌子不许摘下来。事后听被“送”的难友说，他们脖子上挂着沉重的黑牌，一直走到半夜才回到学校，沿途有不少看稀奇的人还不时向他们吐唾沫和扔石头。我庆幸我这个“瘟神”逃过一劫，没有被“送”。

只要没有批斗会，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劳动改造。刚开始是没事找事，想方设法折磨你。学校运动场堆了两三万块砖，负责管理“群专”的红卫兵小头头勒令我们上午把砖从运动场的一头搬到另一头，下午再搬回原处。时逢暑天，烈日当空，我们累得筋疲力尽，浑身大汗淋漓，造反派们却乐得哈哈大笑。

后来固定下来，“黑帮”们每天上午清扫全校三座大楼所有的二十几个厕所，从8时到12时，紧紧张张才能搞完，经红卫兵检查稍不合格还得返工重来。

我们还经常被派去参加运粮食、拉煤、扛水泥等重体力劳动。好在当时我年轻力壮，还挺得住，一百斤重的水泥一次可以扛两袋，拉煤时一气动往汽车上扔一百多锹煤粉（每锹约



二十来斤)。几位上了点年纪、身体有病的“牛神”可就惨了，干这种重活十分吃力，由于“表现不好”往往受到红卫兵的责骂和体罚。

1968年9月中旬，在军工宣传队的带领下，全校师生到双阳县农村参加秋收劳动。为了做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甚至日日讲、时时讲，把生产劳动同斗批改“结合”得更好，宣传队把关押在“群专”的全体“黑帮”分配给各连排（当时将全校各部门、各班级分别编为半军事化组织），作为活靶子。我和一位副院长被分到政治部机关那个排。

到了生产队，排长（一位姓张的造反派教师）个别训导我和那位副院长说：“来到农村要好好劳动，改造反动立场，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和革命师生的教育，只许你们规规矩矩，绝不允许乱说乱动！”我们唯唯听命，劳动都很卖力。当时秋收主要是收割高粱和黄豆，劳动量相当大。那位副院长已五十多岁，并患有高血压，干起活来自然跟不上进度，常被甩在后面“打狼”，因此不断挨批。

田间休息时，由排长主持，召开有社员参加的“地头批斗会”，让我们两个活靶子胸前挂上用小黑板制作的牌子，低头弯腰站在中

间，周围是或站或坐的师生和社员。排长向大家宣布了我俩的罪行，并说我们在劳动中“表现很差，干活不使劲，有意拉后腿，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对这种顽固分子，必须斗倒斗臭！”于是参加批斗会的群众高呼“打倒”之类的口号。一帮村里来看热闹的小孩，没见过斗“黑帮”的场景，看了批斗会觉得挺新鲜有趣。

劳动中，每天还要在地头跳一次“忠字舞”。农民不会跳，便由师生教，看他们扭来扭去，不像个样子，觉得十分滑稽可笑。我们两个“黑帮”不属于革命群众之列，没有资格跳革命舞蹈，心里反而暗暗感到高兴，说实话当时我对这种丑态百出的举动极其反感，巴不得逃避此类敬神活动。

在农村这些天，生活是很清苦的，每天早午晚三餐都是同样的小米饭加盐拌萝卜缨子，外加米汤，但谁都不敢流露半句不满的话，因为越穷越苦才越革命嘛。

好不容易熬到9月底，为期十来天的秋收劳动结束了。来时是乘汽车，返回长春时却是徒步行军，九十里路程，午餐每人只发两块面包，真正的食不果腹。回到学校，革命师生可以回家休息，准备欢度国庆，而我们这些“黑

帮”们仍到“群专”，集中看管。

为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我们还同全校师生吃了一顿“忆苦思甜饭”。先“忆苦”，每人一碗掺了榆树叶的玉米面糊和两个同样原料制作的窝头，说吃不吃是考验每个人革不革命、对毛主席忠不忠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么一上纲，谁敢不吃！和我们关在一起的伪满洲国儿皇帝溥仪的御医、头戴“历史反革命”、“汉奸”、“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四项帽子的陈教授，为表示自己悔过之心和重新做人之意，竟主动要求吃双份“忆苦饭”，当即博得红卫兵的表扬。天哪，一位年近古稀的老知识分子，肚里灌进两大碗粥和四个窝头，我真佩服其食量之佳，不，应该说是态度之虔诚。

后“思甜”，吃饺子，每人二两。因那时年轻，又刚参加了十来天的重体力劳动，消耗较大，我是全部吞下去了。可怜那位陈教授，此时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配“忆苦”，无法“思甜”了。

每日三餐，都要站队去食堂，就餐前还要站在食堂门口毛主席像前低头弯腰请罪，监管的红卫兵一声“开始”，“黑帮”们就齐声高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牛鬼蛇神一个也跑

不了。”然后逐一自报“罪名”，如“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等等。有次轮到门诊部赵主任，他硬是不报，手持钢鞭的红卫兵食堂炊事员阎××逼他：“报！你这个地主分子。”赵说：“我不是地主分子。”阎当时二十四五岁，膀大腰圆，打人凶狠，人称“阎王”，当即大怒，当头就给他一鞭。赵仍不报，接着又是几鞭，直打得赵在地上打滚，已是满脸鲜血。

后在一次劳动时，我曾劝他：“老赵，你怎么那么傻，好汉不吃眼前亏，让你报你就报嘛。”他说：“我根本不是地主，要是承认，几个子女不就完了？”结果赵被冠以“冥顽不化”、“抗拒改造”的罪名，多次惨遭毒打，这位吉林省的名医、中医内妇科专家终被活活打死。我们这帮“牛”字号的伙伴们终日恐慌，人人自危，惟恐步赵的后尘作冤死鬼，接受血的教训后都不再作无谓的反抗，埋头劳动，接受批斗态度也好，一切为了保存自己。

每天晚上，是“黑帮”们的学习、开会时间。强令我们背诵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老三篇”），那时我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差。后来为了配合清理阶级队伍，要“黑帮”们端正态



度，丢掉幻想，彻底交待罪行，又加上《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好家伙，完完全全把我们当成国民党对待了，我从内心极度反感，但毛主席的著作还是照读照背，每日不停。

“清队”继续深入，各地区、各单位挖出来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整个中国大地处于红色恐怖中，“牛鬼蛇神”们自杀成风。吉林省委书记处雷书记、省卫生厅穆副厅长也未能幸免。学校亦不断有人“自绝于党和人民”，连党委副书记李品三也上吊身亡。李是1937年参加共产党的老干部，对党忠诚，原则性强，为人忠厚，团结同志，因被造反派每日轮番批斗、毒打，全身伤痕累累，有时内衣内裤被血粘牢都脱不下来，实在挺不住了，方走上绝路。

在这种形势下，我思虑万端，悲愤难平：想我出身革命家庭，全家多名共产党员，伯父生前是中共四川地下省委负责人之一，30年代初英勇牺牲。父亲是1927年入党，长期在中央工作的老干部。哥哥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自己十六岁就响应国家号召参军抗美援朝，近二十年工作、学习一贯表现良好，从未犯过错误，为何竟落得如此下场？党和国家乱

成这个样子怎么收拾？继续窝窝囊囊地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越想越悲观失望，轻生的念头油然而生。我考虑，解脱虽不难，但割动脉我下不了手，服毒太难受，上吊死后样子可怕，最佳方式就是爬上门前那座二三十米的高烟囱，两眼一闭跳下去，以结束身心的痛苦。在离去之前还考虑要留下两份遗书，一份给妻子、女儿，告个别；一份给军工宣传队，既抗议，又规劝。

给军工宣传队的信好写，除表明自己的心迹，还批评他们搞派性，是非不分，说明我之所以要走这条路实出无奈。我死固不足惜，希望用我生命的代价使他们清醒一些，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鉴别真伪，保护好其他受冲击的领导干部，不致像我这般受诬陷，再造冤案。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尸谏吧，我应有这种勇气。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不切实际，但却说明了我当时既悲愤又真诚的心情。

可是给妻女的遗书如何写？让她们忘掉我，好好地活下去？但说这种违心的话有什么用？他们能活得好吗？恐怕不仅达不到安慰的目的反而会起副作用，给她们带来恶性刺激和永远的痛苦。管他呢，人到了这一步，顾不了

太多的了，总之是要给她们有个交待才行。

但转念一想，觉得这样不明不白地去见马克思似太轻率，自杀，不就说明是“畏罪”吗？扪心自问，我究竟何罪之有？死，证明不了自己清白无辜，反倒给人以口实：你没有问题为何要叛党？而“自绝于党和人民”的人，其家属将永无抬头之日。我死倒容易，但妻子必将整日以泪洗面，说不定也会随我而去，留下孤零零的幼女，从小失去父母，她将何所依靠？我若把孤儿寡母拖入悲惨境地，在九泉之下也难瞑目。思来想去，心中矛盾重重，死耶？活耶？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决，夜不能寐，始终难下决心。

后来，又认为：“文革”中基层所发生的许多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并不知情，按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运动后期往往要进行甄别、平反，还是等等看吧。可见那些受冲击者，一念之差就易走上不归路。

1969年冬，中苏两国军队在黑龙江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全国形势骤然紧张。上面决定大批干部下放农村，走“光荣的‘五七’道路”，“建设巩固的红色根据地”。新年临近，下雪了，电工在安装校门庆祝元旦的彩灯，远处传来稀疏的鞭炮声。但这十分勉强的点缀并



未增添些许节日气氛，也未给人们带来一丝欢愉，反而使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和冷清。置身此时此景，一下子又忆起在部队的岁月，联想现时处境，还不如到边疆与敌血战一场，以遂我之夙愿，于是身不由己地填了一阙《调寄满江红》，直抒胸臆：

爆竹声声，
唤醒了
红灯白雪。
囿囿中，
几多迷茫，
几多悲切。
欲登珠峰发长啸，
再上苍穹揽明月。
十八届春秋功与过，
随烟灭。

乌江东，
阴山北，
胡马窥，
刀兵列。
拥锐甲七亿，
岂惧沙鳖。

七十年代风云紧，
壮士酬国志如铁。
枪声起问余何所献？
满腔血！



发配边疆

1969年冬，省革委会决定，全省大批干部下放农村，实行“四带”——带行政关系、户口、党团组织关系、家属。说这是“斗批改”的需要，战备的需要，走不走“五七”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表现。一时间，形成人员大转移，家庭大搬迁，管你愿意不愿意，有无困难，凡榜上有名的都得下去，一些身患重病者也被强迫抬上汽车火车。

学校决定爱忧第一批到农村，



在新化七队时的旧居

去向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现龙井市）。12月下旬，我们把家彻底收拾一下，打点行装，作好准备。六岁的女儿寄养在北京外婆家，不在身边。动身那天，敲锣打鼓欢送光荣的“五七战士”，爱忱胸前也戴上一朵红花，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学校决定她一人先去，我要等问题处理以后再下去。她提出自己一个女人孑然一身到少数民族地区不方便，要求与我一起走，未获允许，造反派头头威胁说：“一起走，这对处理帅雪晓的问题不利！”她又要求先去北京把女儿接来，也不准。无奈，只

好忍痛含泪向我告别。我送她到汽车旁，无人敢搭理她，惟有我默默地为她送行，叮咛她多加保重。此情此景，令人好不心酸。此一去远行到一个十分陌生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谁知是祸是福，听天由命吧，反正这命运早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过了新年，我的问题已作处理，于是作为第二批下放干部，1970年1月7日离开长春乘火车奔赴延边。正当隆冬季节，这年吉林下的雪很大，寒风呼啸，从车窗望去，一片漫无边际的雪原，车上暖气不好，虽穿着厚厚的棉衣仍感到很冷。同车厢的全是学校下放干部，彼此都很熟，但几乎无人交谈，各怀心事，只有隆隆的车轮声伴随我们向北行进，就这样在沉闷中于次日上午抵达终点站延吉县。

下火车后，一行人被安排到县招待所小憩，县领导和“五七”办公室领导来看望大家，表示欢迎，这是我们新的父母官和顶头上司。午饭后，下派人员分配所在生产队的人分头认领，陆续将各人领走，算是完成了交接。

爱忱和生产队派的社员赶着牛车来接我。虽然我们分别才仅仅半个月，但这十几天里两人都有着无限的孤独与忧思，每日都在惦念着对方。现在我们终于团聚了，自然有说不出的

高兴，但愿从此不再分开，共同去迎接困难，踏上那前程难卜、漫长无尽充满凄风苦雨的路。

过去我们也曾到过农村，但那只是短时间支农性质的，顶多十天半个月，劳动一结束就回城。这次下放农村会有多久，谁也不清楚，反正估计为期不会短，也许从此再不返城。我们没有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缺乏农村生活的经历，是典型的“农盲”，能适应那种陌生、艰苦的环境吗？前途何在，难道就这样了此一生？想到此，困惑、忧虑、无奈、空虚一齐袭来，悲观已极，惟有听天由命，我们别无选择，无法抗拒。继而又想，来到农村已是铁的事实，一同下来的干部多着哩，事情都是人干的，要学会在逆境中生存，要自我奋斗，别人能行，我们都还年轻，经过努力定会适应环境，也准行。于是渐渐安下心来，既来则安，准备在往后的岁月中去迎接新的生活，新的考验。

我们下放所在地，是延吉县光新公社新化大队第七生产队。牛车虽然慢，好在只有十几里路，大约个把小时就到了。村子坐落于山沟。沟长约七八里，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群山，植被很好，都属新生林，一眼望去郁郁葱葱，

充满生机。七队是新化大队最远的一个生产队，又是纯山区，下放干部谁都不愿去，学校带队者有意将我们这对“反革命”安排在这里，谅我们不敢有二话。其实七队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离山林近，解决烧柴方便。全队三十六户人家，人口一百多，全是朝鲜族农民，我们在此反倒成了少数民族。

学校下放到新化大队的，除我们夫妻外，还有党委组织部长、党办主任、教授、讲师、药剂师和总务干部。带队的是位造反派小头头，他身负双重任务：既监管我们这批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又为自己镀金。基本上每个生产队安排一户下放干部。下乡之前给我们规定的任务是：通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改造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同时也参加农村的斗批改，“建设巩固的红色农村根据地”。公社把下放干部和下乡知识青年编为“五七”连，大队叫排，生产队就叫班。

七队的社员开始时对我们不冷不热。也有人知道我们是“文革”中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位姓李的中年社员曾问我：“老师，你们过去是党员吧？”得到我的回答后，他很同情。但农村干部对待我们却很不客气。到生产队的次日，一位公社派到新化大队帮助搞斗批改的姓

金的干部找到我说：“今晚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你要把自己的问题向贫下中农作个交待。”我回答说：“我的问题已由原单位处理过了，没有必要再到这里来说。”把他顶了回去。显然，下放干部中有人（很可能就是带队的那位造反派）已经把我们在“文革”中的问题捅了出去，这必然会使我们极其被动，看来今后在队里劳动、生活将困难重重。

但农民看问题却非常注重实际，时间一长，七队的社员从我们来后各方面的表现（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出勤多，农活学得快；关心贫下中农，无偿向有病的社员赠药；同大家打成一片，群众关系好；主动做下乡知青的工作）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夫妻俩不是坏人！”听到这金玉良言，当时我们真感到莫大的安慰。

劳动之余，每天晚饭后都有社员到我家来串门。开始多是中老年，后来主要是队里的年轻人和下乡知青。朝鲜族很重礼教，讲究辈份，不同年龄段的人不在一起玩。青年来得多，中老年则不屑与之伍，自然就不怎么来了。这样一来，年轻人反而感到高兴，觉得在我家可以无拘无束。尤其是我们1971年搬入新家之后，地方宽敞了，他们几乎每晚光临，



逐渐成了我家的常客和好朋友。我们在一起聊天，互相学习对方语言，高兴时也唱歌、跳舞，玩得很开心，感情日深。这批青年朋友在劳动和生活中给了我们许多帮助。

新家是按每户下放干部 400 元标准由政府拨款建的，按我们的意见设计为朝鲜式住宅，泥木结构，有主室、客房、子女间、厨房和仓房，屋顶苦稻草。我们自己在房的两边搭了厕所和柴屋，用小白桦树夹了围障。屋前有一小院坝，生产队在屋旁划给两分菜地。屋后是一条山涧，两边长满了密密的矮柳树，是夏天的天然浴场。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比较方便了，觉得在延边农村终此一生也无不可。这里的生活、环境、气候比起东北其他地区的农村，还是比较好的。

当时在下放干部中有种传言，说是上头有精神，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一年锻炼，二年过渡，第三年开始取消工资、城市粮食供应和干部身份，与社员一样凭工分领取口粮。尽管从未正式传达过，但这消息传播甚快，大家都在这么说，宁可信其有，一时搞得人心惶惶，有些家无强劳力的人更是忧心忡忡，为将来的苦日子犯愁。我那时反倒没有多大顾虑，因为以我们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讲，在生产队



当年使用的厕所

可以算中上等劳力，我俩每天各挣七八个工分，每年以干二百至二百五十天计，吃饭还是不成问题的。若再搞点养殖业，还可贴补家用，日子应该能够混得下去。

下乡不久，爱忱去北京父母处把女儿接来，她已六岁多，该上学了。为了解决下放干部子女读书问题，在新化学校办了一个汉族复式教学班，招收下放干部的七八名子女上学，抽一名延吉市下乡汉族女知青孙淑美当老师。这个班办了两年后，因教学条件所限，加之一些下放干部陆续抽调回原单位，学生所剩无几，只好停办，女儿也由爱忱送到北京寄读。

开头的两年，我们生活相当艰苦。由于吃

供应粮，每月都要赶着牛车进城到指定粮店购买。供应粮品种，每人每月只有一斤大米，五斤面粉，二两油，其余全是玉米、高粱、小米等粗粮。蔬菜不多，尤其是从10月到次年5月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只有白菜、萝卜、土豆这“老三样”。猪肉，每人每月半斤。新化大队是水稻产区，对其他队的下放干部，各生产队都相当照顾，给每户换些大米。而七队领导对我们却另眼相看，一直未换大米给我们。反倒是下到新化的上海知青对我们友好，他们每年秋收后都回上海探亲，一去几个月，分的大米吃不完，于是便与我们换全国粮票，所以后来我们也以大米为主食了。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为了给女儿增加营养，在开春化冻时我便到屋后山涧里捉哈什蟆，它肚内的油是有名的营养品。同时，也鼓励女儿去稻田里捉青蛙，给她炒蛙肉吃。雨后，让女儿到生产队牛房柞树栅栏上摘新长出的木耳，加鸡蛋一炒，就是一道很好的菜。

分给我们的两分菜地，我种上各色蔬菜，精心莳弄，虽然土质不好，长得也还可以，解决了不少问题，社员都很羡慕，夸我能干。这愈加鼓舞了我在这里长期扎根的信心，心想只要勤劳，舍得干，照样可以活下去。

5

躬耕垆亩

我和爱忱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现在既然来生产队安家落户，第一要务自然就是参加生产，从头学起。

1970年春天一到，全队就忙了起来，开始送粪、选种、育秧、搭防风障、犁田。清明过后，附近山上金达莱花陆续绽放，在万绿丛中分外耀眼。金达莱被称为朝鲜族的族花，象征祥和美好。在我们刚参加农业生产时，这美丽的花朵就复苏露出笑脸，不知这景象是否也



七队的水稻丰收在望

预示着我们的未来？

抢种旱田，必须在插秧大忙前完成。队里以种水稻为主，不多的旱田种植烟叶、玉米和土豆、黄豆。适逢天旱缺雨，只能抢时间抗旱点种，运水上山，这要用大量劳力。除两辆牛车拉铁桶盛水外，大部分靠妇女顶水。顶水这活，是朝鲜族妇女的看家本领，她们从小就练，终生用这种方式取水，所以驾轻就熟，毫不费力。我们用扁担挑水，一次两桶，比她们效率高，比起不习惯肩挑的男社员也胜过一筹，虽然开始时感到吃力，但那时我们只有三十多岁，时间一长慢慢就练出来了。

五月，金达莱花盛开的时候，插秧大忙季节开始了，每日清晨生产队通过队里的有线广播安排社员活路，一般是安排爱忱同妇女们一

起拔秧苗，我则同男社员一道修整田埂或运送秧苗。公社提的口号是“不插六月秧”，意在争分夺秒完成春播，所以每天劳动量相当大，早出工晚收工，起早贪黑地拼命干。中青年是插秧的主力，一块水田里几十人排成一排，头也不抬地操作着，不时唱起优美动听的朝鲜族民歌，插秧的速度相当快，七队有的社员还获得过公社插秧能手的称号。这样忙到五月底，全部水田完成插秧，人们已经疲惫不堪，到这时才能松一口气，得到适当休整。

一年之计在于春，完成插秧是件大事，队干部和社员都很高兴，队里决定杀口猪会餐，以示庆祝。队长找到我说：“老师，我们朝鲜族不会做菜，请你今天来主厨，做几个汉族菜，中午全生产队在一起喝酒。”我从未做过这么多人的菜，但不好拂了队长的意，便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一位社员粗通此道，主动充当我的助手。我俩从上午九点钟左右开始忙活，一头猪的净肉至少也有五六十斤，光切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刚开始做准备工作，就来了两位老大爷等着开饭，这更急煞了我。当天按我的计划做了滑溜肉片、红烧肉等四道菜。全队老小一百多口会餐，当然男人们少不了酒。不大工夫，已是风卷残云，吃了个碗底朝天，大



下放农村的第一位

老师朴长成夫妇

伙非常满意，不断有人对我翘起姆指说：“老师召索（行）！”“召斯米达（好极了）！”“马西索（好吃）！”我给他们露了一手，受到好评，心里当然是美滋滋的，十分得意。

新化大队第五生

产队是苹果梨专业队。苹果梨是延边地区果农经过长期试验，用苹果和梨杂交成功的新品种水果，为延边地区特产。它味道鲜美，水分特足，苹果与梨的味道兼而有之，以延吉市和延吉县种植较多。

到了秋天苹果梨成熟的季节，在新化大队的统一部署下，各生产队都要派社员到五队帮助收摘。1971年国庆前，我同爱忱也和七队许多青壮年劳力一起，吃过早饭就赶到五队。不一会儿各生产队的支援大军也纷纷赶来，其中不少是下乡知识青年，同我们都很熟，大家在一起为收获丰硕的果实而忙碌着，依照五队社员的指导不停地从树上摘下成熟的苹果梨。效率很高，到下午五时左右即已基本抢收

完毕。

参加这项劳动，既劳累又愉快，但许多人都愿意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随意品尝这美味的水果，但是许吃不许带走。参加摘梨的人们身在果园，无不尽情享用，抓紧时间解馋。有经验者，会选择味道最好的梨，即那种全身均匀的青色的果子。如果梨身上带红色，那是直接日照过多，味道远不如藏身于树叶下生长的梨好吃。而我们和下乡知青，却不会鉴别优劣，只一味挑大个的梨吃，不时引起社员们善意的嘲笑。等我们明白过来，再选以上两种不同质地的梨子细加品尝，果然差别不小。

九月底十月初金秋季节，水稻陆续成熟，开镰收割。今年风调雨顺，是个丰收年。我第一次割水稻，进度相当慢。几天后逐步熟练，连割带捆基本上能跟上一般社员。稻子收完晒干立即运回队里打谷场，连夜用机器脱粒，爱忧也同女社员一道从事这项劳作，往往干到半夜。

稻谷晒好扬净，就要立即装袋，上交公粮。我也赶着牛车向县粮库送公粮，粮库工作人员检查后将七队的稻谷质量评为一等，我们无不高兴。有社员自豪地对我说：“七队交的

公粮，每年都是一等。”70年代初，主副食供应紧张，送完粮后粮库发给每位送公粮社员一张豆腐票，然后队长领着我们到饭店夜餐，凭票领豆腐（每人一份，重约四两），再买两三斤酒，大伙吃得津津有味，皆大欢喜。回家的路上，已喝成半仙之体的送粮社员个个醉卧车中，任识途的黄牛慢步悠悠伴着铃声把我们载回七队。

延边盛产制作香烟的原料烤烟（当地习惯称黄烟），种烟是生产队的另一项重要生产任务，这也是队里主要的现金收入来源。烟叶成熟，正是骄阳似火的8月，全体社员一起出动，顶烈日冒酷暑收摘，用草绳把烟叶编成串，挂上烟楼，由有技术的社员烧煤加工烘烤，每炉需烤制一个晚上。次日凌晨二时左右，大伙又得起床取烟。烤好的烟叶发脆，为避免破碎要轻轻地从烟楼架子上取下，逐串铺开放到室外打露水，待烟叶受潮变软了再从草绳中取下，分等捆扎，送往县烟草公司收购站。

在农村，有干不完的活。秋收后，我还干了不少杂活。

一是积肥送粪。赶一辆牛车，逐家逐户去掏厕所，将粪便送往牛圈旁的粪场堆积。次年开春前，社员再将已充分发酵但仍未化冻的粪

土用镐刨碎，用牛车或爬犁送到地里。

二是改土造田。入冬后，一年生产任务已完成，再无其他农活，农民进入休整期，在东北叫“猫冬”，大约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但为了给明春生产创造条件，队里要平整部分水旱田，一般是男劳力参加，要抡大镐，劳动量大，不过时间不长，上下午各干两小时即收工。

三是整理打石场。生产队附近有处打石场，是队里一项副业。几名有经验的社员专项作业，放炮取石，炮响之后需有人在石场作清理工作，我不止一次地充当这种既劳累又危险的角色。

四是搞水利建设。按公社规划，要整治供应农业生产用水的六独河，工地就在七队旁边。1971年冬，工程开始。新化各队都抽了不少壮劳力，我和爱忱都积极投入，两人一副箩筐，不停地装运河石，起初是我们两人抬，后来新化二队的上海知青李雪良愿意跟我组合。我们每天不声不响地抬啊抬，筐里的石头装得满满的，不顾腰酸背疼，整整抬了一个冬天。

经过1970、1971两年的生产过程，我们不仅初步学到了一些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而且感情上也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可说是做到了想社员之所想，关心天气情况和农作物长

势，与农民的共同语言多了起来，这可能就是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吧。时至今日，就个人来说，我们都觉得这一课补得值得。

与此同时，在思想上认为参加农业生产也没什么了不起，累一点苦一点是事实，但远离城市，置身于青山绿水间，倒也悠闲清静，农家欢乐无穷，与人无争，没有政治运动的冲击，没有无休止的争斗，不必为安危提心吊胆，整天同思想单纯对人实在的农民打交道，人际关系处得相当自然和谐，身体也很棒，有何不好呢！

1971年9月下旬，正在收割水稻，生产队金队长在田间休息时，突然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对我说：“老师，咚！咚！打下来了。”我听不明白，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林彪的，跑了。”旁边一位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的青年吕京赞说：“他是说林彪乘飞机外逃，掉下来摔死了。”我大吃一惊，问是否真有其事，金队长说是真的，可能要正式传达。不久，公社“五七”连向我们传达中央文件，证实了这条爆炸性新闻。

林彪事件，使我进一步思考“文革”中发生的种种事情，对许多百思不解的问题似乎理解了一些，但又觉得难以捉摸。到1973年清明，



与另一位老师姜忠植夫妇在一起

这天是我三十八岁生日，下放已两年多了，同时下放的干部有的已调回学校。联想起自己这些年来的遭遇，如今已近不惑之年，“反革命”的帽子依然戴在头上，不禁悲从中来，感慨不已，形之于诗，草就我来延边后的第一首打油诗：

地球转一转就是一天，
三百六十五转又过去一年。
公历四月五日恰逢清明，
按农历正好是三月初三。

三十八岁说来只过去一半，

这一半路程引起我无限感叹。
韶华似海蓝江水不断逝去，
往事有几多值得留恋！

幼时抱负免不了过于天真，
但报国壮志却深深地埋在心田。
民族的屈辱使我懂得仇恨，
红太阳光辉引导我了解人间。

啊，人间充满了同志的亲爱的温暖，
憧憬美景怎不令人一往直前。
十五年来从未停止挺进的脚步，
白天复夜晚，夜晚又白天。

干的是文的武的诸般琐事，
想的是大的小的各种贡献。
丢掉了浑身污泥满肚秽气，
增添着钢样筋骨赤色肝胆。

孙行者在八卦炉炼了四十九天，
因烟熏落了双怕风的火眼。
咱也是磨练太少，熬煎太浅，
害个病名叫不识风险。

风雨里瞧不清前进的方向，
乱军中敌友我一场混战，
刺斜里冷不妨投来一枪，
身背后又遭敌施放暗箭。

队伍早已开始新的进军，
战士梦魂一再飞赴前线，
一颗红心仍在嘭嘭跳动，
最热切地向往着火与剑。

何时能治愈心灵创伤？
哪天将复我非鬼之面？
纵使力竭还要战斗，
哪怕声嘶也得呐喊！

母亲总是忘不了她的儿子，
儿子每日都把慈母思念。
却为何久久不得母子重逢，
有什么东西从中作祟阻拦？

冬去春来冰雪即将融尽，
大地又会缀上美丽的图案。
安得巨帚扫去愁云惨雾，
使希望之光展现在赤子眼前。

地球转一转过去一天，
三百六十五转又将是来年。
明年四月五日是否清而又明？
三月初三能否偿我多年之夙愿？

这个年代，我们始终是在生活在动荡中的被动者，只好在劳动中煎熬着，在沉默中期盼着。

有一段时间爱忱在放猪。她和猪们相处很好。在那个危机四伏的世道，在猪群里她居然得到了愉悦，过了几天轻松而又惬意的日子。当时她写了一篇《放猪生涯》，记下了这段生活。这是1972年的冬天，她已经收兵回营，没有担任猪司令了。今将她的文章收录于后，因为她的生活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6

放猪生涯

感谢学校革委会的“关怀”，使我们这一对“现行反革命”能团聚在祖国的边陲，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这山清水秀的少数民族地区安家落户，过上田园生活，享受农家之乐。

我们在生产队里和广大农民朋

友朝夕相处，同劳动、同休息，与城市生活相比，虽然苦和累，但离开了那装点刺眼的“红海洋”，以及整天被各种不同批斗队伍喧嚣着的闹市，能同被隔离审查了三年多的丈夫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感。

插秧开始，由于化肥水的浸泡，我皮肤过敏，双手溃烂了。承蒙生产队长关照，不让我下水田，委任我当了“猪司令”，任务是放猪，每天把猪群赶到山坳里自己觅食。

当年齐天大圣被玉皇大帝封为弼马瘟，人家有七十二变的本领，所以根本看不起眼这个芝麻官衔，依然我行我素，老子哪天不高兴，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回花果山享福去了。可我哪有这个本事，接了委任状后，一直很不安。

虽然“部下”只有二十六位，却老少几辈，参差不齐，又关养了一个冬天，所以第一天放猪时，刚开圈门，都一窝蜂地急着往外冲。为首的是那帮贪耍的小崽子，由着自己的意愿，向各个方向狂奔，继而青壮年也冲出栅栏。最难缠的是那头乳房几乎拖到地上的“猪祖母”了，它肥胖的身子赖在地上不动，你若用棒棒打，它立刻站起，打着不满意的鼻响，

也斜着眼睛，一动不动地向你示威，甚至有时会冲过来，呲着那长牙，要咬你一口似的。说老实话，我从小就没接触过猪，每当这时，心里总是很害怕。

乱了营的队伍是很难集合起来的，东寻西找，也凑不够数。真是又急又气，累得满身大汗。傍晚，在社员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才从山上把两名“逃犯”逮了回来。如果找不到，我还真怕在“反革命”的头衔上再戴上一顶“破坏生产”的桂冠哩。

经过几天的休整和训练，小、中型猪基本上能按照我指定的路线出发了。可老母猪还在想尽办法对付我，三步一停，两步一站，或赖在泥塘里打滚。我想这老家伙是久谙世故的了，硬的一套它不吃，我就只好换软招，多去体贴关心它。

通过观察发现，它怕热，也喜欢干净，于是我常常赶它到清水塘去洗澡；它背上经常发痒，我就用树枝给它挠痒，以联络感情。三挠两挠的，它居然对我亲近起来，有时我甚至觉得它的目光也变得温顺和蔼，不怀敌意了，好像在向我微笑。

放猪的山坳，离村里五六里地，旷无人烟，时而有野兽出没，还真有点吓人，但这是



个放猪的好所在。由于当猪司令取得了初步成功，我几天来的恐怖感也顿觉消失了。猪们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我的感情，但它们能理解我的苦心，能为我做伴，同它们在一起，总比同那些长着人的躯体，藏着蛇蝎心肠，专门颠倒是非，趋炎附势，整人害人的伪君子们相处要更安全些。这也是我由苦到乐迈出的第一步。

我率领的“队伍”出发时容易，但到了目的地，我还是总要在它们觅食的地方不断数来数去，生怕哪一位又溜了去；一旦走失一头，周围是延绵不绝的群山，天哪，我可到哪儿去找！因此，每天早出晚归，我要不停地走，去找，去无数遍地数。累，当然就不用说了，可这总不是长久之计，我常常晚上躺在炕上想招来治理它们，好摆脱目前的困境。我想到驯兽员，往往用食饵来引诱对手，我何不用此手段一试呢？于是，翌日清晨，我除了背上自己的干粮外，还满满地装了一袋黄豆和玉米，脖子上套个哨子，赶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我边吹哨子边撒黄豆和玉米。真是奇迹，它们居然不像往天那样一个劲地往前冲了，只是围着我转悠。尽管它们为抢吃那一粒两粒的黄豆、玉米，把我冲撞得东倒西歪，但这办法灵验了，它们听我的指挥了，我可真高兴，打心

眼里更爱它们了。从此，我每天迎着朝霞，吹着哨子，撒着豆子，带领“队伍”向山坳进军。

到山坳后，任猪们各自找野菜充饥，我或躺在松软的野草丛中看书，高兴时向蓝天献上一首没有听众的歌曲；或登上半山腰俯瞰那田园风光，聆听栖歇在树丛中鸟雀的欢唱。夏天的中午，猪们在阳光下睡觉，我可以在矮柳树围着的溪流里洗个澡，再美美地睡上一觉，真是又轻松又惬意。

夕阳西下时，我只需一声口哨，猪们会很快集合在我的周围。没法报数，我只好清点，到齐后，我便带头向村子跑去。毕竟两条脚的跑不过四条脚的，它们拼命地跑，很快就把我远远地甩在了后边。等我赶到猪圈时，它们已经吃上热乎乎的晚餐了。看着它们吃得那么香甜，一天天长大，长胖，毛色发亮，活泼可爱，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时的心情非常快乐，什么反革命不反革命的，早被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冬天来临，野草枯萎了，猪只好圈养。有些成年了，快要婚配繁衍后代；而有些膘肥者，就要成为刀下鬼，充当人们盘中佳肴。我真舍不得它们，更不忍心听到它们被屠宰时的

哀嚎。人怕出名，猪怕壮。看看“文革”中挨整的人有几个是草包！看看那些不负“猪司令”放养之恩而尽快长膘肥胖起来的猪，下场多么可悲！

明年开春，我愿生产队继续聘请我为“猪司令”。更愿我的“队伍”增丁补员，家庭兴旺，为人们奉献更多的美味佳肴。和猪们在一起，我有莫大的欢乐，更有安全感。



深情地喝一口第二故乡的山泉



打柴活路

解决做饭和冬季取暖用柴，是农村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化七队紧靠山林，烧柴本不成问题，但我们一直在城市生活，从未打过柴；而打柴要用牛拉，我对高大的延边黄牛又心存三分畏惧，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也成问题了。

下乡之初，为解决我们烧柴问题，是由生产队派社员帮助打。时间长了，总靠别人也非良策，还是要自力更生。

许多热心的社员都很关心我

们，尤其是忠厚朴实的朴长成和乐于助人的新化学校老师姜忠植，对如何打柴和怎样使牛给了我很多具体指导，可以说是手把手地教。

在经过几次同社员一起上山打柴之后，自信已掌握了打柴和使用牛爬犁的方法，于是我开始独立操作了。1970年1月的一天，吃过早饭，我和爱忱到牛房借了一条性格温顺、易于驾驭的母牛，向朴长成借了爬犁，兴致勃勃地到不远处的一处山林，用斧头吹了几十根直径五六公分的柞木，放在爬犁上捆扎停当，套上牛，下山往家走。山上厚厚地盖着一层雪，起初赶着牛走起来还算顺利。但由于柞木装载不当，走不一会儿牛就拉不动了，原来是后爬犁左边的立柱被压坏。我们赶快松开牛，把柴卸下来修理爬犁，但怎么也修不好。天已经黑下来，四顾无人，寒风刺骨，又冷又饿，我俩既着急又害怕，真是束手无策，母牛在一旁不安地挣绳跺蹄。我真后悔，不该逞强任性，干这种毫无把握的冒险事。正在此时，忽见远处点点火光朝这边移动，有人在喊“老师”。啊，原来是朴长成等几名社员不放心，见我们去了一天这么晚还未回来，怕出事，特意打着火把前来寻找。危难之际遇救星，这下子才使我们放下心来。老朴很快就把爬犁修好，我们一起

把柴拉回家。首次出师就不利，我心中很不是滋味，但从这次失败中也学到一些东西。

在延边山区生活，一年要集中打两次柴。一次是春季，插秧之前，带镰刀上山，选一两处林木（最好是松树）茂盛之地，砍伐枝桠，晒干后集中堆放，作为夏天用柴。因夏天用柴只为做饭，不需烧炕取暖，用柴量不大，用两三天时间也就打够了。

第二次是中秋节后秋收之前，准备冬天烧的柴。这段时间雨水不多，打好的柴不致沤烂。冬天用于做饭的柴，以每户每天一捆到一捆半计，约需三百捆左右，一般劳力一天打二十五至三十捆，就需要十天半月。刚开始我的效率很低，每天也就打个十几捆，后来逐渐熟练，经验多了，每天也能打三十来捆。捆好的柴摆开放，待晒干后再串成堆，以免被积雪掩盖不易寻找，需用时赶爬犁上山拉。

这三百捆只是用于做饭的烧柴，到了冬季每隔十天半月还要上山砍些较粗的树，劈好堆码，每天晚饭后填进灶膛一些烧炕御寒。

所以，我们经常都要上山。金钱沟两边的山，由近而远，几年来差不多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对打柴由不会到会，由当成负担到发生兴趣，不仅因这是山区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



内容，而且山上景色绝佳，空气清新，视野开扩，从事这项劳作也是享受大自然，对我来说有一种难得的乐趣。从春至夏，女儿多次跟我们上山，除了帮助打柴，还不时到林中采摘蘑菇、野菜。冬天上山，爱忱常同我一起去，我伐木，她则在齐膝的雪地里来回搬运，虽然气候寒冷但常常累得满头大汗。

我们也曾经历了危险。一次打完柴装好爬犁下山，我让爱忱坐在爬犁上，自己赶牛。下山时经过一段较陡的坡地，由于坡大路滑，重心前压，牛顶不住越走越快，我左手使劲拉缰绳，右手用树枝抽打它的鼻子以减缓下行速度，但无济于事，最后牛小跑起来，眼看就要失控，弄不好可能造成人畜伤亡。于是我急忙喊爱忱下来，但爬犁速度很快，她根本无法往下跳。此时牛已无法控制，它拉着爬犁载着爱忱往山下飞奔，我想这下完了，非出事不可。幸好跑了一段，爬犁卡在一树桩上，翻倒一旁，牛停了下来，爱忱也平安无事，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还有一次同集体户两知青陈常新、王立本一起上山打柴，我一副爬犁，他俩一副。打完柴装好爬犁，我先走，他们在后。下到半山，只听上面不断在喊“帅叔”。我想可能出事了，

便把爬犁停在一旁，拴好牛，再往山上走。到跟前一看，他们的爬犁翻了。小王对我说：“哎呀好险！我赶着爬犁，下坡控制不住，牛使劲跑，我只好撒手不管，心想这下牛非死不可。没想它命大，爬犁被树卡住，牛才停了下来，只是爬犁翻了。我走到牛跟前，赶紧跪下来给它磕了几个头。”小陈说：“这小子尽乱整，到现在连爬犁都赶不好，还要硬充好汉。”说说笑笑，三人一起把爬犁调正，重新把柴装好拉回。小王给牛磕头的事，在队里年轻人中传为笑料。

打柴，我每次都是借用社员的爬犁，后来想，要长期在此扎根，经常都要使用爬犁，与其总是向别人借，不如自己制作。于是我从1971年起虚心向农民求教，拜朴长成为师。老朴是队里有名的生产能手，制作爬犁更是行家，在他耐心指点下，我终于掌握了制作要领，到林中选好材后开始尝试制作。爬犁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套牛，后一部分装柴。第一件作品难免粗糙，但凑合可以用。以后做的就好多了，基本合乎结实好用的要求，受到老朴的夸奖。我先后制作了三副爬犁，一直用到离开七队。

除制作大爬犁，我还制作过两副人拉小爬

犁。冬季用柴量大，社员向队里借牛拉柴往往要轮班排队。为了克服借牛难的矛盾，我同爱忱就用小爬犁到近处山上打树疙瘩，这种东西用于烧炕保暖很解决问题。冬天树疙瘩冻在地里发脆，很容易用斧头敲下来。把打下的树疙瘩装在小爬犁上，不太费劲就拉了回来。



打柴常用的爬犁和牛车。

这棵海棠树是当年作者亲手所栽



鸡鸭成群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适应，我们相继过了劳动关和生活关，与农民的关系处得相当融洽，想到这山清水秀的长白山区就是我们的归宿，心逐渐安下来。但农村生活确实清苦，为了改善生活，增加营养，我们决定养鸡。

先买了一只孵蛋的母鸡，给它三十个受精蛋，二十一天后，顺利孵出了一群活泼可爱的鸡宝宝。这只母鸡孵蛋很有经验，不仅将三十个蛋全部孵出，而且会带鸡娃。一

天上午，母鸡正领着它的子女在前院觅食，忽然飞来一只鹰在屋顶上盘旋，它发现了目标，越飞越低。母鸡见状连忙“咯咯咯咯”地将子女们唤到身边，张开翅膀把孩子们保护起来。鹰不愿放过这些美食，于是凶猛地俯冲到母鸡身边。好个老母鸡竟临危不惧，毫不示弱，勇敢地进行殊死抵抗，昂头向鹰啄去，逼使鹰向后退却，并准备作第二次攻击。正在危急关头，及时赶到的我喊叫着赶鹰，鹰才无奈地飞走了，鸡群安然无恙。

在这第一批鸡的基础上，我们连买带孵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鸡群，最兴旺时大小鸡达几十只之多，成为全生产队惟一的养鸡大户。饲料，是每月买谷糠，拌白菜叶和萝卜土豆皮喂养。早晨把鸡放出去，让它们在山边自行活动和觅食。收工回来，那场面才热闹哩，一大群鸡跑着跳着甚至飞着奔到我们身边，不离左右，等候开饭。对我们来说，这真是一大乐事。

性成熟的母鸡，生了一段时期的蛋，往往就想孵小鸡，当“月母子”。对这些担负生儿育女任务的准鸡妈妈，开始我们都给二十五至三十个蛋让它们孵。后来想过妈妈瘾的母鸡多起来，就不能再给那么多蛋，有的只给十来个

或五六个，需要适当控制数量，搞点计划生育。一段时间，我们家往往同时有五六只带小鸡的母鸡，各领一帮鸡雏，可谓鸡丁兴旺。

几只母鸡各有特点，我们依其外貌或性格分别赐名。最早的那只元勋鸡，孵鸡最多，子孙满堂，劳苦功高，命名“老祖母”。一只高大漂亮的芦花母鸡，走起路来高视阔步，很具绅士风度，呼为“英格兰”。一只黑母鸡温驯孤僻，从不抢食斗殴，也不孵蛋，称为“修女”。“修女”未免太寂寞了，我们有意拿几只刚孵出的鸡雏给它带，它居然接受下来，白天领小鸡觅食，晚上护小鸡睡觉，像亲妈一样尽心尽责，故我们也称之为“干妈”。

鸡多，自然肉多蛋多。公鸡不能多留，除选一只身体强壮色泽美丽的作种鸡外，其余长到半斤以上逐步宰杀，每年从中秋到次年春，每月可吃一两只，丰富了我们餐桌上的内容。鸡蛋越来越多，全家三口每人每天至少可以吃一个蛋，还不时送些给下乡知青和产妇。令人不解的是，朝鲜族产妇收到我们送去的鸡蛋，对这种坐月子中必不可少的普通营养品，却无例外地自己舍不得吃，而要留给丈夫享用。

我们还孵了几只小鸭。买了六只受精鸭蛋，提前七天给抱鸡婆，七天后给鸡蛋（孵

鸡需二十一天，孵鸭却需二十八天），它不管鸡蛋鸭蛋来者不拒。小鸭与小鸡一同破壳出世，要赶快把小鸭分出去，否则母鸡会视小鸭为“非我族类”加以虐待，使劲啄之。六只小鸭十分可爱，饲以鸡蛋黄，长得很快，不久就能分辨出性别，巧得很，全是母鸭，我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吃鸭蛋又不成问题了。

新化三队下放干部老董也孵了几只鸭，可全是公鸭，把他气得要死。老董找上门来说：“你家全是母鸭也不好，缺只领头的公鸭，干脆我用一只公的换你一只母的算了。”我们欣然同意，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鸭子的品种是北京鸭，全身皆白无一杂毛，长大后每天到屋后山涧中游水觅食，由公鸭率领，早出晚归。母鸭产蛋率相当高，每天天刚亮就下蛋，女儿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鸭笼中捡蛋，这是她的一大乐趣。从此，我们餐桌上又多了一道菜。

当时吉林省下放干部在参加生产劳动之余，普遍养鸡喂鸭，借以改善生活，增添情趣。在下放干部编的许多顺口溜中，有几句是“鸡一群，鸭一帮，还得感谢王淮湘”，表达对省革委会流放大批干部的不满，也是对王淮湘之流的辛辣讽刺。

1973年11月，爱忱受公社之派送县劳动局一名干部到天津治病，女儿也早送去北京寄读，家中只剩我一人。月底，接单位同志来信说，省里决定把尚留农村的全体下放干部收回原单位，即将派人下来给我们办学习班，总结“四带”下放的经验，然后就调回，并说已给我们预分了住房。一提办学习班就令人反感，谁都知道这是变相整人，惹不起，躲得起，横下一条心：遛，到北京亲人处散散心。次日即到公社“五七”办公室领了12月份工资，回来就做走的准备。一大群鸡鸭怎么办？决定一部分送给农民朋友，一部分宰杀，连同积攒的几百个鸡蛋鸭蛋一起带走。

次日我就登上火车，携带自己的劳动成果奔赴北京，做返回单位前为期一个月的休整。

9

知青风波

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度过了一段无悔的岁月。从上海、北京、长春和延吉市也来了不少中学生，到长白山区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到新化七队时，这里已有一个知青集体户，是这个县的先进集体户，知青们都是从延吉县城来的朝鲜族学生。原有十来个人，招工、参军、升学陆续走了几名，1970年初只剩两男两女。从公社到



1974年春同新化部分下乡知青合影

生产队对这个先进集体户都很关心，给他们盖了相当不错的砖瓦结构住房，划给了菜地，知青们各方面表现也好，是生产队的一支重要力量。

1970年春，按照县和公社的安排，又有五名从延吉市来的汉族知青到了七队，三男两女，他们是陈常新、王立本、张景春、张萍、张淑芬。上级的意图是将两个民族的新老知青混编为一个集体户，实行以老带新，加强民族团结。

按当时的政策，下乡知青第一年仍吃商品粮，不参加生产队粮食分配。城市粮食供应，

每人每月只有那么几斤大米白面，绝大部分为粗粮，而原有的几名朝鲜族知青，早就和社员一样吃队里分配的口粮，主食全是大米。新老知青合在一起生活，由于粮食供应品种不同，主食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新知青要分食老知青的大米，而老知青则要多吃些新知青的粗粮。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几名朝鲜族老知青无论如何不同意接纳新知青，而汉族新知青又不愿意单独立户，双方僵持不下。

生产队为此专门召开会议，队干部、贫下中农代表、新老知青参加，也邀请我与会。讨论很激烈，新老知青各持己见，社员多数倾向合，也有人主张由公社将新知青安排到其他生产队，而队长态度却不够鲜明，要我发言。因刚到生产队，政治处境又不好，我本不打算讲什么意见，但在队长的一再催促下，还是表了态。我认为公社这样安排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知青成长，合比分好，至于生活上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可以克服。

谁知我这意见却引起朝鲜族知青的极大不满，会后他们就放风说我是在政治上犯了错误的干部，是汉族知青的“后台”、“黑手”，准备同我“算账”，甚至把已招工到县城的两名原集体户朝鲜族知青专门找回生产队呆了一

天，意在向我和新来的汉族知青示威。

在生产队向大队汇报的同时，我也不失时机地向大队“五七”排负责人作了反映。不久公社表了态：维持原决定，新老知青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民族团结集体户。

合是合起来了，但双方却同床异梦，感情怎么也合不拢，隔阂严重，矛盾重重。老知青不愿吃粗粮，屡有怨言，并对有些新知青的一些毛病看不顺眼。有的新知青也确实表现欠佳，如生产上出工不出力，干活不主动，不关心集体户。情况愈来愈不妙，后来竟发展到无米下炊或无人做饭，菜地闲置不种，偷拉社员打好堆在山上的烧柴，发生口角更是常事。知青们无心生产，情绪低落，集体户内冷冷清清，少有欢声笑语。七队知青集体户的名声江河日下，成了新化大队的老大难问题。社员眼见好端端的一个先进集体户搞成了这个样子，也很痛心。

见此情景，我和爱忱也于心不安。我们商量，认为还是要协助生产队做工作，在困难情况下帮知青们一把，这些孩子单纯、热情，本质良好，都有上进心，只要给他们以必要的关心和帮助，加以正确引导，情况一定会发生变化，集体户完全能够办好。这样做，即使暂时

招来误解和流言蜚语，也不足畏，反正我们是出于好心。

首先做汉族知青的工作，主动与之接近，经常谈心，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实际困难，和他们一起出工，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树立好的形象，为自己，为家庭，为生产队争气。对他们多鼓励少批评，在他们有了进步时生产队也及时加以表扬。

为了帮助集体户改善生活，我们多次送去鸡蛋鸭蛋。春天，到市场买来菜秧，同知青们一起在集体户菜地里种上蔬菜。秋季，我们夫妇主动邀约知青们上山打柴，只几天时间就为集体户准备了充足的过冬柴。还专程到延吉市对汉族知青进行家访。逐渐，我们取得了汉族知青们的信任，他们开始转变，不仅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与朝鲜族知青的关系也得到改善，大家和睦相处，集体户又有了新气象。朝鲜族知青也改变了对我们的看法，不再认为我们偏向汉族知青了，还经常到我们家来玩。

队干部和社员对集体户的变化感到十分高兴，对知青们更加关心了，对我和爱忱也开始尊重了。

仅仅一年时间，新化七队知青集体户经过一段曲折艰难的道路，面貌骤变，重振昔日雄

风，名声日盛，由大队、公社先进集体户步步攀升，一跃而为县、地区和省先进集体户，多次受到表扬奖励。

从1973年起，到1974年我们离开时，七队两个民族的知青先后参加工作、升学，后来有的当了技工、干部，有的成了教师、工程师，有的担任了建筑公司经理和医院院长，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他们当中，有的至今仍然同我们保持着联系，长白山麓培育的友谊之花常开不败。



2001年秋在延吉市同当年部分下乡知青重逢



HUOHONGDEJINDALAI

金 达 莱

10

“五七”难友

“文革”的任务或步骤，有所谓“斗、批、改”之说。“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批”“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权威”，“改”所有旧的规章制度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

干部下放农村，大约也属于“改”的内容吧。把那么多人斗了批了，怎么处理？于是便想了一个妙法，让他们去走“光辉的‘五七’道路”，放到“五七”干校和

农村去。除了这些人，还有属于逍遥派的、掌权那一派对立面的成员和“新生的红色政权”对之不感兴趣，认为无用的人员，这些人被称为“旧人员”，统统赶下乡。有少量造反派骨干也下放农村，但他们是所谓的“火车头”，到农村呆上一年半载，镀完金就回去当官，而我们这些“车厢”则被甩下继续改造。

吉林省的各级干部到“五七”干校的少，下放农村的多，“四带”在全国算是个创举。加上医务人员走“光辉的‘六二六’道路”，下放到农村的人数更加惊人。光是来到延吉县光新公社的下放干部就逾百名，加上这些干部的家属子女，人数翻两番还多。这不仅使广大干部、家属深受其苦，也给农村带来了诸多负担，既劳民又伤财，真是得不偿失。

下放到新化大队的十几名干部，除极个别外，都对我们抱着同情、友好的态度。这些同志中多数与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多年在一起工作，对我们都很了解，下乡后给了我们许多关照，因而更多了一层新的友谊。

新化六队的下放干部高新民、王泰玲夫妇，常同我们接触，彼此在一起谈劳动、生活安排和下乡感受，使我和爱忱初来乍到时在冷漠的环境中感到一丝温暖。高新民 1947 年或



1972年新化大队全体下乡插队落户的五七女战士

1948年参军，河南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原是学校党委办公室主任，为人正直。他是学校指定下放新化大队干部的两名带队者之一（另一位即上文提到的那位造反派小头头），但因看破“红尘”，不争名利，不屑与造反派为伍，故下乡后从不管事，主动“让贤”退隐了。高的夫人王泰玲教授，是国内医学界比较有名的病理解剖学专家。粉碎“四人帮”后，老高夫妇调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王是该院病理科学术带头人，虽年逾古稀，至今仍在医疗技术岗位上奋

斗不息。1978年爱忱落实政策后调学校党办负责信访工作，故高又是爱忱的直接领导，他们在工作中配合密切。高、王至今仍同我们保持联系，战友加难友，关系毕竟不一般啊。

分到新化五队的是吴明亮、陈涤夫妇。两人原都是印尼华侨，50年代归国求学，毕业后就一直留在国内工作，从这一点就足见其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吴当时是学校外语教研室英语讲师，“文革”中也被当成“白专”。夫妇俩对人都很诚恳、热情，与我们友好相处，下乡期间和返校后彼此都有过从。出于对归国华侨的照顾，在新化时将他们分到专事苹果梨生产、劳动量相对不很大的五队，可见农民和基层干部还是懂得并认真执行有关政策的。

药剂师王野夫和夫人张瑞一家被安排在一队。一队紧靠公路，离延吉县城较近，我们每次到县城经过他们家，都要去看看他们，聊一会儿天。王性格内向，与世无争，群众关系好，工作勤勤恳恳无可挑剔，但身体瘦弱，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困难较大。他善学习，下乡期间居然学起了朝鲜文，而且还掌握了相当的单词和短语。他的三个年幼子女均随其下乡，家庭人口多，花销要大一些，其夫人没有工作，只靠王一人不多的工资生活。听到三年后下放

干部要被取消工资，仅凭在生产队的劳动工分领取口粮的消息后，老王犯愁了，几次同我谈起此事，说他一家人口多，老的老小的小，缺少劳动力，将来怎么办，很为此担心。我对他给予安慰，帮他分析，说这消息只是传言，上面并未正式传达，不一定是真的。即便成为事实也用不着怕，车到山前必有路，几年后他的子女均已长大成人，或工作或参加农业生产，全家生活应该不成问题。

三队的董香亭是位总务干部，能吃苦，会安排家务和生活，可下乡期间仅靠自己一人不多的工资维持六口之家，实在不易。董心直口快，好提意见，“文革”中日子也不好过，常被抓“小辫子”，因而对“文革”尤其对下放农村反感至极。他工作多年，看问题还是有一定水平的。1973年底，公社奉上级旨意办下放干部学习班，要大家认真进行一次“触及灵魂”式的思想总结，重点是谈下乡期间的收获和干部下放农村“四带”的好处。办这个学习班的意图，明显是为将这批下放干部调回原单位作准备。所以在学习班上，大都是应付敷衍，违心地称颂“光辉的‘五七’道路”，说“四带”如何如何好，是“培养锻炼干部的有效途径”，云云。惟独董公开唱反调，激动地

说：“好什么好？我看‘四带’没有必要！如果‘四带’真好，为什么《红旗》杂志上的有关文章连一句都没提过？为什么别的省不搞而惟独你吉林省这么搞？”此语一出，真是“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引起满堂惊愕，并立即遭致主持会议者的批评，事后听说校方和当地领导准备收拾老董。我曾劝过老董说话要谨慎，尤其像我们这种被整过的人更要注意，接受教训，千万不要引火烧身。不过说实话，董香亭同志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对，他敢于直言、不惧打击的精神还是令人钦佩的。

被称为“大金”的朝鲜族护士金仁淑和丈夫朴龙南分到四队。由于他俩都是朝鲜族，所以比起其他下放干部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更易与当地干部、社员沟通，在新化活动也相对多些，如为我们充当翻译，帮助联系一些事情等。朴原是法院干部，与当地有些单位和许多干部熟，下放农村期间帮县、公社作过一些事情，还曾被抽调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专案调查（本书另有专节记述）。“大金”是个老护士，有一定的医疗护理经验，在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曾帮大队卫生所作过一些工作，附近社员有个病痛也常找她。这对夫妇，对我和爱忱都友善，朴还认为对我们处理不当，分析说

以后会获平反甄别，给我以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还有一位叫王景祥的食堂管理员，尽管身患高血压，又非大小当权派，“文革”中未受任何冲击，和老伴、幼女一道，也被“凑数”下放。他来得稍晚，新化各队安置的下放干部已经“满员”，故被分到紧邻新化大队的龙南大队。老王一家同我们相处很好，下乡期间我们也多次去他家看望。王出身农家，很勤劳，在屋子周围种了不少蔬菜，尤其是他种的南瓜长得特别好，藤蔓爬上屋顶结的瓜又多又大，有次摘个瓜款待我们，那味道相当好。王回学校后老伴就去世了，他本人不久也因高血压病而不治身亡。许多人都说，像老王这样的人本不该下放农村，否则他的生命很可能会多延续几年。后来爱忱曾专门去看望过老王那个失去父母的可怜女孩，听说学校已为她安排了工作，我们也就感到放心了。

除了学校一起来的下放干部，新化大队尚有两家延边当地的下放干部。

一是方仪炫夫妇。方是朝鲜族人，解放前参加工作，曾在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后到延吉县任县委统战部长。夫人李正顺，是位医生。老方是位很不错的民族干部，懂政策，有水平，经验丰富，为人正派，在新化时

很受当地干部、社员尊重，在下放干部中也有威信。他是新化大队的“五七”排长，常常主持下放干部的学习会。老方一家被安排到我所在的七队，同我们接触较多，每天见面。他家三个子女，其幼子和高新民幼女、吴明亮独女、王野夫幼子和我女儿在乡下时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常在一起玩的好朋友。大约1972年，老方被抽调回县任物资局局长，粉碎“四人帮”后又升任县政协主席。1985年他离休后到内地旅游，曾来成都看过我们。1991年、2001年我们夫妇赴延边，也专门去拜访这对难友夫妇，相见甚欢，一起兴致盎然地忆起三十年前的往事。共过患难的友谊，的确弥足珍贵。

另一位是延吉市财政局的干部蔡传礼和夫人裴秀英，他们与朴龙南夫妇同在四队。蔡为人洒脱、直爽，夫人也会处事，相处几年中同我们关系较为密切，有共同语言。他俩不忘难友，我们返长春后，80年代初，老蔡还热心地为我和我的同事代购过不少延边林区特产黑木耳。他的小儿子在长春上大学期间，也受父母之托来看望过我们。

光新公社河南大队还有一位姓李的长者，已五十好几岁，是长春市财政金融学校的下放干部，这么一把年纪了也让人家到农村安家落

户。我们同他本不相识，也无来往，只在公社召集下放干部开会时见过几面，印象是此人十分忠厚，寡言少语，显得心事重重。妻有病，子年幼，李老还得亲自上山打烧柴。1972年秋，他在打柴时被一种形同臭虫的昆虫（东北人称为“草扒子”，延边语叫“阿延”）咬了。这种东西很讨厌，专门传播森林脑炎。李被咬后发烧，躺在家里休息，以为是感冒了，没太在意，只服了点治感冒的退烧药。过了两天仍不见好转，体温不仅不退反而上升了，人已处于昏迷状态。家里这才着了急，赶快找生产队长要了一辆牛车送县医院诊治。但是被耽误了，为时已晚，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终致不治而死。我们新化的下放干部闻此噩耗，虽说同老李并不很熟悉，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彼此的处境、感情是相通的，故相约一起赶到李所在生产队，为李的丧事帮忙。那天我们共同作了白纸花，送了花圈，向这位难友告别，为他送行，同时要求县里和老李原单位处理好后事，对李的遗属妥为安置。看着哭得死去活来悲痛欲绝的李的老伴和儿子，我们都止不住唏嘘泪下，伤心不已。老李同志以近花甲之年不远千里来到长白山区，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染此绝症，葬身他乡，岂不哀哉！



以上所记下放干部都是很不错的同志。所谓不错，一是说他们本身人品上乘，忠于事业，工作勤奋，数十年中对人民做过贡献。二是指他们待人诚恳，对人关心，明辨是非，尤其是对我们这对“文革”中有“重大问题”，被审查被批斗被处理的“黑帮”式人物，并不歧视，并没有敬而远之，惟恐被扣上“划不清界限”的帽子；相反，还那么关照，把我们当成同志和朋友，给予同情和友爱，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人。

难友之情是真挚可贵的、纯洁高尚的，发人深思，感人肺腑，我将永志不忘！



2001年秋同原七队部分五七战友、
下乡知青和社员在一起

11

狩猎见闻

长白山多飞禽走兽，新化七队所在金钱沟的两边山上也常有野兽出没。

据七队上了年纪的社员讲，附近山上原有一只虎，有人见过它的身影。有一年秋天，两个十几岁的女孩进山割苔条，这只虎追赶一头狍子风驰电掣般从她俩身旁跑过，只顾追逐它的猎物，却未伤人。离七队不远处右边山上林中空地，有个数平方米的平坦大青石，上面堆了许多野猪、狍子等动物骨头，是

虎的就餐处，不少社员上山打柴时均曾目睹。但这些年沟里开山取石，经常炮声隆隆，进沟里的人也多了，再也不见虎的踪影。

但有狼是不争的事实，不仅许多社员和知青见过，我们亦曾与之狭路相逢。那是1972年秋，我同爱忱在山上打柴，忽听右前方树叶沙沙作响，我抬头透过灌木丛望去，但见一只像狗的动物往这边走来。当时以为是猎犬，后面必定有猎人，出于好奇想看个究竟，于是便走出树丛站在没有树木遮掩的爬犁道上。响声越来越近，这条“狗”很快就出现在我面前，离我咫尺之遥，距离最多不超过三米。这家伙与我不期而遇，可能太突然，竟不知所措，一下子愣在那儿一动不动，眼睛盯着我。我仔细一看，它双眼通红，尾巴拖地，目光凶狠，究竟是什么狗，分明是头体格强健的公狼！人狼相遇，勇者胜。我把手中镰刀高高举起，大吼一声“杀”！那公狼在我突发的叫喊声中受到惊吓，扭头就跑，一路狂奔，消失在山林中。刚过了不到半分钟，从公狼方才来的方向又过来一只个头略小的母狼，沿公狼逃走的方向遁去。这时我才跟爱忱说起，彼此都感到有点后怕。

后来一次也是在打柴时，在一片坟地里发



现一只狐狸，在坟堆间转来转去。我手持镰刀追寻了一阵，很快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社员也说，狐狸相当狡猾，极难捕捉。

山上狍子倒有一些。在七队驻扎训练的部队，曾用自动枪在村边猎获过狍子，这引起了我对狩猎的兴趣，也想过过瘾。有天借来社员李成禄的双筒猎枪，起个大早，天刚亮独自一人就上山了。踏着厚厚的积雪，顶着凛冽寒风，穿越茂密林海，仔细地搜寻着，发现了几处狍粪，是刚便不久的，还未冻硬。于是在周围林间、崖下耐心寻找，费时许久，跑了十几里雪地，却一无所获，原因是去晚了。原来狍子生性胆小，一般在黎明时分和黄昏后出来觅食，很快食毕就到密林深处躲藏休息。后来我又带猎枪上过一次山，仍然不得要领，无功而返。

有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刘永禄，是我们的邻居。这孩子读书不怎么行，可对狩猎却相当内行，本领高强，每年收获颇丰。他用铁丝套野兔，十套十中。方法是，在下雪后先行侦察，发现兔子脚印，就巧妙地布上铁丝套，兔子习惯走老路，很容易就被套住。

春天，刘永禄掏鸟窝，专捉刚孵出不久的猫头鹰，到水田里捉青蛙来喂养，待雏鹰长大

后拿到城里市场出售，每只五元左右。据说猫头鹰肉治疗头痛很有效，故不少人争相购买。

小刘还有一绝：可以赤手空拳活捉野鸡。开春后，野鸡发情要找配偶。常言道，在山识鸟音，只要听到野鸡的求偶声，他就立即上山，躲在矮树丛中，如是公鸡找伴，他就学母鸡叫，是母鸡寻偶他就学公鸡叫，简直学得惟妙惟肖，难辨真假。听到应答声，野鸡往往上当，以为异性就在眼前，于是很快就寻声飞到刘藏身之处，越寻越近，慢慢挨到他的身边。这时，他就悄悄把手伸向野鸡，出其不意地将其擒获。原先有人向我介绍刘永禄的这手神奇绝技，我还半信半疑。有次见他拎着一只野鸡回家，说是用上述方法刚刚捉的，我才打心里佩服这位狩猎天才的高超技能。

刘永禄还善捉獾子。金钱沟里各处山上常有獾子踪迹，他熟悉獾子的习性和居所，事先进行调查，找到獾洞，弄清獾是在洞里还是外出未归。獾洞一般都有两处出入口，如发现洞内有獾，他便让其弟在一处洞口不停地往里灌水，自己则守在另一处洞口旁。前洞一进水，獾必然会从后洞外逃。刚一出洞，就会被捉。有次我经过他家门口，正见他在剥獾皮，一次就捉了两只，取出獾油出售，用獾油治疗烧伤

烫伤是很有效的。

七队在金钱沟最远处的七沟，有一块不小的旱地，每年在那里种植土豆或玉米。1970年春播时，我们曾同社员一道去那里播过种，见树上挂着一块铁板。我问其缘由，社员介绍说，这山上有群野猪，大小二十多只，庄稼成熟了它们就来祸害，所以到时候队里要派人看守，猪一来就敲铁板惊吓野猪。

次年冬天，从和龙县来了几名猎手，带了七八条猎犬，在七队牛房稍事休息后就上山了。他们早就听说七沟那边有不少野猪，此次是有目的地专为猎这群猪而来。猎手多，猎犬也得力，只两天工夫就将这群野猪猎杀殆尽，但是单单不见了猪王。七队有人见过此猪，体重至少有五六百斤，由于常在松树上蹭痒，浑身沾了很厚一层松香，身上已经发黄，凶猛异常，难于接近。猎人们虽然已经斩获甚丰，但未逮到猪王心有不甘，于是第三天一早吃过饭，就出发寻找猪王。先把猎犬放出去，人在后面跟进。

不一会，行动迅捷、嗅觉灵敏的猎犬们就在一处山林中发现了猪王，将其团团围住，吠声不绝。还未等主人赶到，勇敢的猎犬们就向猪王发起了进攻。首先上阵的是只黑色头犬，

发现猎物后它往往带头发动攻击，是群犬之首。它毫无畏惧地朝猪王冲了过去。猪王毕竟具王者之气，经验老到，以守为攻，等犬来到面前，它不慌不忙地一甩猪头，锋利的獠牙立即将犬肚划破，肠子流了一地。紧接着二犬也不甘示弱地冲向猪王，猪王如法炮制，二犬立时倒毙。见此状况，其余猎犬都吓得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围在猪王周围，不停地吠叫唤主。猪王趁此短暂的休战间隙，赶忙突出包围，落荒而逃。待猎人们闻声赶到，猪王早已渺无踪影，他们只能抱住那两条牺牲的猎犬失声痛哭。从此，这头作恶多端、难以制服的野猪首领从金钱沟消失了，再也无人见过，极有可能是远走他乡，去重建它的野猪王国去了。

12

洪灾余生

1971年7月，一个周三的下午，按规定是大队下放干部学习日，地点在新化大队队部所在地——四队。虽然天下着大雨，我和爱忱仍准时前往，遵守这“雷打不动”的制度。

到四队只三华里左右，中间要过六独河，有座简易独木桥通向两岸，平时过桥后即上公路。今天因雨量大，河水陡涨，过桥后还须涉渡一条新形成的溪流，水不深，只及膝盖，挽起裤子就淌过去了。

学习会上，东拉西扯、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阵之后，不到5时结束，我们到大队供销社买了点蛋糕，就急急忙忙地往家赶。雨仍不停地下着，云层很厚，看样子是停不下来。其他



当年冒险涉渡的六独河

下放干部都说雨这么大，六独河肯定涨水，劝我们今天不走了。我们考虑女儿一人在家，不放心，坚持要走。

到了六独河过公路一看，我的天，水怎么涨得这么快！独木桥早被冲走，中午来时所见新形成的那道溪流已同六独河主流连成一体，放眼望去是一片汪洋。原来放木桥的那一头还有个约十平方米的小岛，从此岸到小岛虽说仅七八米宽，但水流湍急，不易涉渡。即便到达小岛，还有第二道溪流挡道。

能不能渡？没有把握，我先下水试试。刚一下去，水已齐腰，再往前肯定更深，看来此处不行。我们只好另寻比较浅的渡点，于是一直朝上游方向走了一里多地，水都又深又急。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想女儿还等着我们回

家，心里很是着急，但又不敢贸然下水涉渡，那样太冒险。就这样，我们在水边走来又走去，徘徊复徘徊，始终下不了决心。

犹豫了许久，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涉水回去，要冒这个险。我说：“别的地方都不行，看来还是从原处过吧。”爱忱勉强同意了。下水前，我们先把雨伞、蛋糕等物扔到河中心小岛上，以减轻涉渡时的负担。

我在左边上游方向，让爱忱在我右边，我俩紧紧挽着胳膊，试探着一同下到水里。刚下去，水就齐胸深，被冲得站立不稳，往前迈了两步水已深及脖颈。爱忱立即惊呼：“不行，赶快回头！”我大声吼道：“快朝前走，不能回头！”这时湍急的水流把她冲得摔了一跤，拉着我一起跌到水里，我俩满脸是泥水，看样子她已难以坚持。我赶紧把她拽起来，拉紧胳膊使她不致倒下，对她喊叫着：“快，往前冲！”

人到了危急时刻，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量，我们不顾脚下被急流冲动无数河石的撞击，强忍着不断呛水的苦痛，忘了即将被洪水吞没的危险，拼命往对岸冲。坚强的意志，求生的渴望，实用可行的措施，奋力拼搏，终于使我们渡过了危险，艰难地到达了小岛。

一上岸，我俩力气几近耗尽，双脚被石头

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立即瘫倒在地，这时才感到浑身疼痛和无力。尽管是如此狼狈不堪，但我们毕竟战胜了可怕的洪水渡过来了。事后细想，在与汹涌山洪搏斗时，如果不是下定决心往前冲，不是保护得法，稍一动摇或者疏忽，其后果简直不敢想像。到黑龙江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金训华，不就是突遇山洪暴发而牺牲的吗！

在岛上躺了约二十分钟，起身看前面，还有一道支流，虽然没有刚才渡过的主流那么深那么宽，但水流也比较急，看来还须冒一次风险去涉渡。可又担心，我俩以如此疲乏之身，能渡过去吗？正在犯愁，在对岸割牛草的七队知青王立本等人发现了我们，立即涉水过来，把我俩背过去。望眼欲穿一直在家等待我们的女儿，还不知道爸爸妈妈刚才所经历的险境哩。

听队里说，今天与七队相邻的胜地大队一对新婚夫妻赶着牛车进城，回来恰逢涨水，在涉渡时被洪水连人带车一起冲走，到现在还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晚上，躺在炕上，感到阵阵后怕，也庆幸我俩劫后余生。

我们遇险的事，很快就传回学校，有熟人



HUOHONGDEJINDALAI
金 达 莱

开玩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心想，“但愿如此。”



在涉渡处回忆当年大难不死，感慨万端



13

为人作嫁

1972年9月的一天，一起来新化大队的四队下放干部朴龙南找我，对我说：“老师，有件工作想找你参加：帮助县里调查几个人的历史问题。我已被县里抽出来，我跟专案办公室的朴主任说了，他同意你也去参加这项工作。”我当即答道：“我自己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党籍尚未恢复，有什么资格去调查别人？”朴说：“你没看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抓案件复查吗？你的问题肯定不久就会落实。这次咱俩一

起到北京、山东、江浙一带去外调，你就算帮帮我吧。”

朴龙南同志 1948 年参军，战争中负过伤，下放农村前是法院的庭长。他是朝鲜族人，汉语讲得不算好，需要一位汉族同志协助，这点我很理解。再说他对人热情，与我私交也不错，故不好断然拒绝。再说，我也可以利用此次外出的机会，路过北京时到中央上访，申诉自己的冤情。所以，便答应下来。有我做伴，老朴当然感到高兴。

他把这次外调任务向我作了介绍，大体是要找一些人查清县里直接抓的几件要案的重要情节，其中重点是查清金某抗日战争时期在江浙上海等地为日寇效劳，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由于自己当时的处境，我提出调查以他为主，与有关单位接洽，同知情人谈话均由他出面，我则负责作记录和联系交通、食宿。他表示同意。

9 月中旬我们出发，途经北京，山东济南、沂源、羊山、阳谷、张店，江苏赣榆、扬州、南京，浙江杭州、余姚、萧山和上海。出差费标准很低，我们都是挑最便宜的旅馆、招待所住，吃最简单的伙食，有时因乘车赶不上

吃饭就买烤红薯、煎饼充饥，尽量节省。

那时全国都在复查积案，故各地各单位革委会都很配合，我们的外调任务完成还算顺利，许多不太重要的问题都逐一查证清楚。但还剩下一个关键的问题：金某抗日战争时期是否为虎作伥，担任过日伪重要职务，以及犯下过哪些罪行。

线索不多，我们掌握的只有两个人，都是当时金的下属和同伙，是关键人物，此二人都确知金当年的所作所为，非找到不可。他们目前的下落，当时县里向我们提供的，只是大概方向，而且是很久以前的居住地，事隔多年，他们现在究竟在哪里，甚至还在不在世，都是未知数。

我和老朴不辞辛苦劳累，千方百计查找与金某及上述两名关键知情者有过接触的人。最后来到江苏省扬州市，到公安局查卡，通过派出所找到了第一个知情人李某。

原先说好外调是由朴主谈，我作记录。这样安排在北京还可以，在山东也勉强，但到了江浙一带，朴的语言听说能力不足就成了工作上的障碍。与人交谈相当困难，尤其是对江浙话、上海话他简直视同外语，无法交流。这样，只好由我主谈，连记录也由我作。

李某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日伪时期担任过扬州面粉厂的警长，是金某的部下，对金当时的情况相当了解。由于有过罪恶，解放后曾受过审查和管制，现仍属于派出所管辖的半专政对象。被派出所叫来后，李显得很拘谨，低头站在民警面前。民警对他说，我们两人是来找他了解一个人的历史问题的，要他老实回答。李连连点头称“是”，十分谦卑。民警离开后，我让他坐下，向他交待了有关政策，着重说明是通过他调查别人，与他个人无关，以解除其顾虑；还强调他对金的历史很了解，鼓励他立功赎罪，帮助政府查清问题。

这么一讲，他就不那么紧张了，边回忆边讲述了金当年在扬州的罪行，说得相当详细，其要害部分是：1940年前后，金在扬州面粉厂充当日寇鹰犬，负责管理中国工人，经常欺压甚至亲自动手不止一次地毒打工人，并曾奸污女工，中国工人对他恨之入骨，称之为“二鬼子”。日本投降后，金惧怕惩罚，畏罪潜逃，后不知其下落。

我边问边听边记，最后将记录加以整理，交李阅后签字按指印，派出所盖章，终于取到了一份极其重要的证词。一个月来的辛劳没有白费，老朴和我都很高兴。

多日没有休息，现在外调有了重大突破，使我们一直焦急不安的心情松弛下来，于是决定到有名的瘦西湖一游，休整一下。

虽仍在“文革”期间，但毕竟高潮已过，前几年批斗干部，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那种令人窒息、恐怖的气氛已不复存在，学生已回到学校，城市、农村都在“促生产”，社会生活渐趋正常，公园里开始有了游人。名扬天下的瘦西湖未遭大的破坏，狭长的湖面清雅俊丽，五亭桥等景点引人入胜，鉴真大师塑像和纪念馆亦已开放，为数不多的动物开始展出，“文革”的阴影似在逐渐消逝，联系眼下我们正在做的工作，给人以暴风雨已经过去之感，神州大地开始复苏，看来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虽然在扬州有了重要收获，但还要找另一个重要人物——当年金某在扬州面粉厂的同伙张某取证，据说此人在南京。于是我们又赶赴南京，通过公安局查档得知：张某在日伪时期是扬州面粉厂的警察头子，帮助日寇干了许多坏事，肃反中被捕，因历史罪行严重，被判刑二十年，在青海服刑。

老朴完成任务心切，主张立即去青海找张，只要能取证，金某的案子就算铁定了。我经过认真思考，认为此时已是10月中旬，青

海即将进入冬天，气温已很低了，而我们出来只穿了一件薄毛衣，到那里将无法御寒，此其一。其次，青海劳改农场是关押、改造重犯之地，为防犯人外逃，保证安全，往往设在远离城镇、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之荒野处，我们在不知张犯服刑所在农场具体地点（需到青海省劳改局查询），不了解交通条件的情况下贸然前往，完全没有把握，甚至是冒险。第三，张是50年代被判刑的，十几年过去了，而今他已年近七旬，不知还在否？总之，在毫不知情又无把握的情况下远去青海，实在无此必要，很可能会劳民伤财、无功而返。这是我同老朴出来外调的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重大分歧。

我对老朴说：从我们已取得的材料来看，金某的问题已是证据充足，完全可以结案，该回县复命了。如县专案办公室认为有必要，可以函调。朴很勉强地同意了我的意见。

这样，我俩就带着此行取得的全部外调材料，满怀喜悦地踏上了归途。

路过北京小住两日，老朴提出没吃过北京烤鸭，想品尝一下。我带他来到王府井金鱼胡同烤鸭店。食客很多，每张桌子都坐满了人，还有许多人站在桌旁等候，我俩也选了一张无

人等候的桌子等就餐者吃完饭后占座。等了约二十分钟，又有三位军人来到我们准备占座的这张桌旁等着占座。“我们先来，理当我们先占座，看这几个当兵的怎么办。”我想。

又等了约一刻钟，在这张桌上的二人用完餐起身离去。他们刚刚站起，三位军人（从年龄看都是三十几四十岁的人，准是干部）立即抢先用手把空椅子拖过去。我真没想到堂堂解放军军官干出这等极不讲理的事，气立刻不打一处来，对他们说：“哎，解放军同志，排队也有个先来后到，我们等了这么久，你们后来，怎么抢座位？”这几位军人对我不屑一顾，把着椅子不放，有一位甚至说：“你说你先来，我还说我先来哩！”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那个年代，特殊环境造成了个别军人的特殊心态，把部队的光荣传统早已扔掉了。

他这一说，我更不饶他了。我说：“解放军不能搞特殊化，我们当兵的时候处处尊重老百姓，从来没有过你们这种表现。”接着又把老朴负过伤只剩三个指头的左手拉过来给他们看：“你们看看，这是位老军人，负过伤流过血，你们就这样对待革命残废军人！”这下可把那三位给镇住了，加上周围就餐群众对他们投来不满的目光，他们终于噤若寒蝉，悻悻地

离去。这是我们此行的一段小插曲。

抽空，我还为自己的事到中央信访办公室去了一趟。那天到中央上访的人真不少，全都是为自己在“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申诉的。上访者要排队等候，在等候中大都沉默不语，也偶尔有人小声交谈。我问紧挨着的一位五十来岁农民模样的人为何事上访，他说自己是河北省某县的人民公社主任，“文革”中因不支持造反被公社文化革命委员会开除了党籍，现在来请中央“评评理”。

轮到我进屋，接待我的是位三十多岁的男工作人员。在简单询问了我的情况后，我把申诉材料交给他。他略微翻了一下说：“我们会把你的材料转到吉林省，你回去等着吧。”

不管怎样，我总算把问题反映到中央了。我期盼着。

回到延吉县，我将全部外调材料整理好，并写出全面的外调情况书面汇报交老朴，由他去向县专案办汇报，此时已是10月底，冬季已经来临。

一个月后，县专案办收到青海省劳改局的回函，称我们要找的犯人张某，在服刑期间已于几年前病故。幸好我俩未去青海。

我们一个多月的的外调，划上了一个比较圆

满的句号。一个等待落实政策的“现行反革命”，却去为别人落实政策努力创造条件，并参加对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想起来确实有几分滑稽。虽说此行是为组织、为他人办了一些好事，但从党中央重视解决“文革”各类遗留问题所作的努力中，身处逆境中的我眼前也依稀浮现出一道微弱的曙光。



民族情深

朝鲜族是一个勤劳朴实，热情好客，注重礼貌，能歌善舞的民族。延边地区的朝鲜族，同当地其他兄弟民族和睦相处，长期以来维护了民族团结，各民族携手建设着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新化七队的朝鲜族社员，把我们这户全队惟一的汉族下放干部，当成当地少数民族看待，各方面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照。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首推朴长成夫妇和姜忠植兄弟。朴长成当选过



1991年春在龙井市三合镇山上同朝鲜族友人联欢

县劳动模范，他手把手地教我干活，是我参加农业生产的第一位老师。他的夫人金今淑阿兹妈妮（大嫂），是爱忱的好朋友，为她介绍当地风俗民情，教给她许多生产和生活知识。姜忠植当过七队队长，后到新化学校任民办教师，懂音乐，手风琴拉得好，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也算是队里半个知识分子。他常和我一起谈论国内外大事，交流思想。其弟姜万植，是我的好朋友，为人乐观、正派，有一副令人羡慕的优美男中音嗓子，歌唱得好。文昌福、吕京赞、朴东洙、朴银石、朴京石、赵东石等

一大帮青年社员，都是我家的常客，相互间建立了深厚友谊，劳动之余我们常在一起玩，我用口琴吹奏乐曲，青年们则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就连我们的女儿也有一群小伙伴，她常同与她年龄相近的小姑娘们一起玩耍、拾柴、摘野菜，而且还学会了朝鲜语。

朝鲜族主食以大米为主，菜比较简单，一般是自己渍的辣白菜和大酱汤，每餐必备。最爱吃的传统食物是打糕，类似四川的糍粑，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几乎家家都做，社员往往要送我们一碗品尝。种旱田需到比较远的山上，中午饭在地头吃，社员带米饭，而我们吃城市供应粮只能带窝头等粗粮。中午吃饭时，社员们多次强行同我们交换食物，使我们深受感动。

这里尊老成风，愈老愈受尊敬。老人过六十大寿，照例要请客，子女远在外地也要赶回来祝寿，为老人献上肉食、点心、水果和酒。桌上摆的东西越多越表明仪式隆重，家人脸上也越有光彩。我们多次应邀参加这种生日宴会，众亲友在炕桌周围盘腿而坐，开怀畅饮。父子可以同桌而食，但儿子不得当着父亲的面肆意饮酒，必须把脸背过去以手遮着杯子喝，以示对长辈的尊敬。打糕、米饭用盆置于桌

上，各人吃多少自己用勺往碗里盛，但盆中食物最后不宜吃光，必须多少留一点，否则别人会骂你是“巴比桶”（饭桶）或“堆阿几”（猪猡）。

结婚仪式也很有趣。文昌福娶媳妇，他去女方将新娘子远道迎来。新娘家带来许多陪嫁品，光十几二十斤重的棉被就好几床。新郎赶着载有新娘的牛车刚到村口，就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淘气男青年接过缰绳，赶着牛车拉着新娘到村里各处转来转去，故意让新郎着急，等新郎前去向赶车者求情方将车赶回家。这时客人们均已光临，餐桌上放着一只宰杀煮熟口含大红辣椒的公鸡，表示吉祥幸福。婚礼在司仪的主持下进行，拜完天地、父母，夫妻对拜后，新人开始吃饭。新郎面前碗中米饭里埋有三个剥去壳的煮鸡蛋，按规矩自己只能吃两个，另一个留给新娘享用。这时，客人们才开始喝酒。

酒是男人们最感兴趣之物，虽不能说嗜酒如命，但至少人人喜欢，许多人喝起来毫无节制，一醉方休。春节前，各家都要准备充足的酒和各种食物。春节当天天不亮，男人们就开始串门喝酒，挨家喝，喝了一家又一起赶到另一家，一直喝到夜里，不少人醉得不省人事。

有的酒德不佳，喝醉了就要酒疯打老婆、摔东西。每年数九寒天，各地常发现有倒卧路旁被冻死的醉汉。我以为酗酒乃当地一大陋习，在生产队的五年中我极少同社员一起喝酒。

朝鲜族妇女十分勤劳贤惠，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干活不比男人少，在家还要总揽做饭、洗衣、喂猪、带孩子、侍奉公婆等家务，但她们的地位相对低下，重男轻女的固有传统观念在此地还相当严重。男人一般不怎么干家务活，但也有例外。1970年初我刚到队里，就承担了家里挑水的任务，每天都要挑几挑水。没想到这极普通的事却立即引起社员们议论纷纷：男人说顶水是妇女的事，一个大老爷们怎屑于干这种活；妇女们则觉得稀奇，不可理解，认为妇女顶水才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不久社员吕京赞妻子生孩子，家无其他妇女，迫于无奈吕还是硬着头皮学我的样子去挑水做饭。逐渐，村里挑水的男人多起来，慢慢地就习以为常，以后再也无人讥笑了。可见，习惯是能够改的，好的风气可以人为地树立起来。

1973年12月，我的好友姜万植患尿毒症不幸去世，不仅其家人，连我们夫妇、万植的年轻朋友们都极为悲痛。出殡那天，我眼含热泪，手扶灵柩把他送到南山安葬，在坟前虔诚

地致奠。可怜这位才二十多岁的生产能手，结婚还不满周年，不久前我们参加他的婚礼一起欢乐，想不到而今却又参加他的葬礼，怎不为之痛洒永别之泪！万植的去世，令我惆怅惋惜多日，有天夜里，甚至梦见他飘然来到我的身边，一起聊天，唱歌，半夜醒来再也无法入眠。

1974年初，下放的第五个年头，省革委会决定将仍在农村的全部下放干部收回原单位。此前，大部分下放干部均已回城，我们是属于不受欢迎者之列，故迟迟不得赦还。由于朝夕相处数载，沟通较多，了解颇深，在劳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农民早就不把我们当“反革命”看待。听说我们要走了，社员们都感到有些难舍难离，连日来不断有人到家同我们握手话别，帮助打点行装。

春节将至，生产队朴队长对我说：“老师，今天晚上队里开总结会，同时欢送你们，大家在一起谈谈心，喝喝酒，酒由队里准备。”我说：“联欢吧。”我拿出三十斤粮票，二十元钱。晚饭后，全队社员齐聚知青集体户，把一铺大炕挤得满满的，摆上酒和饼干、咸菜。几年来，我没怎么同社员痛痛快快地喝过酒，眼看要离别了，大伙又是如此热情友好，一起热



2001 年秋同原新化七队部分社员合影

闹热闹也好，于是便放量喝，从8点左右一直喝到12点，连阿兹妈妮们也不示弱，二十斤白酒全部喝光，我至少喝了半斤。社员问：老师，你说不会喝酒，今天怎么如此海量？我回答：“因为要分别了，感谢大家的盛情，一醉方休。”

喝完酒，已到午夜时分，队长宣布开始跳舞。大伙今晚本来就很高兴，加上酒精的作用，就更加兴奋，男女老少轮番上阵，翩翩起舞。朝鲜族擅长歌舞，年长者舞姿愈加优美，简直使人陶醉。我们不顾自己舞技拙劣，也本着“重在参与”这条原则同大家尽情地唱，尽情地跳，舞会高潮迭起，直到凌晨两点，尽欢

而散。酒性舞兴引发诗兴，连夜写诗一首，记下当晚令人难忘的场面：

一九七四度春节，新化七队作总结。
会后置酒来庆贺，促膝相语情切切。
不用行令与猜拳，大碗传递只等闲；
豪饮半斤当喝水，宴罢席中无醉鬼。
慢吹笛，紧击鼓，乘兴跳起朝鲜舞。
高歌一曲《道那基》，一唱众和齐努力。
青年惯于打头阵，宇熙今夕不让人，
左右进退飞满场，汗流满面喜洋洋。
引出一伙老太太，摆摆摇摇上场来，
步伐手势不生疏，人老兴高风姿在。
刚健雄劲刘清白，跳来板眼皆合拍，
攥拳弯腰头晃动，好比南山一青松。
若论风格与传神，最妙还数李明淳，
轻移脚步柔挥手，春风吹送云里走。
阿兹妈妮兴正高，对对双双水上飘，
个个争相献艺技，缤彩纷呈添情趣；
起处微风拂细柳，停时艳阳照桃花，
百态千姿体婀娜，满座同声喊“召沓”
(好)!

李成大，弄名堂，暗自归家巧化妆，
男扮女身人不识，只道进来一女郎；

“女郎”面庞遮白纱，体态舞姿惹人夸，
揭去面纱现本相，原是男儿非姑娘。
此时哄堂笑声起，多人捧腹不能语，
男女老少皆起舞，一时忽然炕拥挤。
“汉族同志别旁观，众人起舞方为欢，
节后齐心搞生产，定叫延边赶江南。”
我观此景已陶醉，凌晨二时不能睡；
我闻此语信念坚，今年准是丰收年！

3月14日一早，队里安排两辆牛车，将家具等物运去火车站。从来别离皆痛苦，分别的时刻匆匆来临，全队社员都来送行，一直手拉手地把我们送出村口，挥泪告别，许多人都诚挚地叮嘱：“老师老卢，你们以后要来呀！”那场面确实感人至深，至今难以忘怀，连我这个不易动感情的汉子，也为这样的告别场面动容，掉下了眼泪，爱忱更是连眼睛都哭红了。民族情意难忘，深厚友谊长存。向数年来待我们如同亲人的朝鲜族父老乡亲辞行，我俩向他们频频挥手，并许下心愿：“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来看望大家。”离七队越来越远，我们仍不时回望那熟悉的山村，和伫立在村头向我们招手张望的亲人。

15

黎明之前

经过近五年下放农村劳动，我和爱忱于 1974 年 3 月中旬返回长春，不久女儿也从北京回到我们身边。学校原分配给我们的一间住房，已被先回来的人占用，不得已只好暂住在学校招待所，谁知一住就是几个月。到了 6 月，天气渐渐热了，全家三口挤在两张小床上，家什塞在床下和走廊。住房始终得不到解决，虽经多次找总务处催问，不是推诿就是搪塞，甚至不予搭理，那脸色实在难看。时值“批

林批孔批回潮”，学校开大会，掌权的造反派头头把我们这批刚回校的下放干部联系起来一起批，说把我们调回来是“请隐士，举逸民”，“复辟回潮”，形势又突然紧张起来，再次折腾，人心难安。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门都不敢接收像我们这样有各类问题的“残渣余孽”，工作自然无从谈起，我们倒是乐得清闲。但思想上却很苦闷，心想并非我们要求回来，既然把我们调回学校，为何迟迟不安排住房，不分配工作？早知如此，还不如在乡下继续当农民。气愤之余，借诗渲泄我的不满：

归来歌

下放归来，备受台上群小之气，不仅工作无着，连栖身之所亦不可得，乃效冯讷而歌。

昔有冯讷者，归来弹长铗，
寄托孟尝府，嗟无车鱼家。
事过二千载，帅讷又磨牙。
三月居客栈，十番赴校衙。
衙门入不易，老爷令难发，
挥手心中悲，斜眼头皮麻。
脚板跑出泡，嘴皮起疙瘩。

“明天”复“明天”，双眼盼欲瞎。
端午着冬衣，三人卧两榻，
病痛思服药，起居多困乏。
廿年功与过，原来是昙花。
早知运不济，何如没有家。
有家居乡里，免了听哇啦，
嘴里一支烟，手中半盏茶。
呜呼吾安去，海角与天涯？
归来啊归来，长铗呀长铗！

又过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给我们分配了工作：我任采购员，负责购买劳保用品、办公用品，后又调图书馆采购图书。爱忱到医院当收款员兼管太平间，既跟活人又跟死人打交道。这年月，以待罪之身而能有一份差事干，就算不错了，什么活都是人干的，别人能干我们怎么不能干？

我们回长春后，延吉县有不少下乡知青、下放干部子女和农村青年陆续到长春读大学和中专，像新化大队的下乡知青姜明姬、陈常新、王立本，同队下放干部方仪炫的儿子方成哲，县劳动局干部金光的女儿金顺子及其同学李美兰等。他们远离父母来长春求学，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年纪又小，需要有人关照。我

们为这些年轻人能有上学深造的机会而高兴，他们也把“帅叔”、“卢姨”当成在长春的惟一亲人，故常来我家玩，几乎每个星期天我家都有这批小客人光临，使我们当时那狭窄的住宅充满欢声笑语。他们的到来，给一直处于郁闷、压抑中的我和爱忱带来了些许欢愉。为了接待好这帮孩子，每到星期天早饭后，我都要骑自行车到长春市有名的副食品商店“圈楼”采购，买些肉食、蔬菜，然后下厨操作，作一顿比学校食堂要丰盛的晚餐（在东北许多学校习惯星期天吃两餐，早9时晚3时），为他们改善一次伙食。从1974年回长春，到1984年调四川，十年间我们总共接待了十几名在长春学习的孩子，或者说十年间从我家走出去十几名大中专毕业生。能为孩子们的成长做点事情，我和爱忱都感到欣慰。

转眼到了1976年，对中国来说这是极为不幸的一年，是国殇之年，是悲伤至极的一年。

1月8日，在久经病魔折磨和江妖一伙迫害之后，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深深尊敬和衷心爱戴、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恩来总理相星殒落，这使我悲痛万分。多年以来，尤其是在“文革”这个特殊环境中，党和

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靠他支撑着，许多内政外交大政均由他主持，他的离去使我们这个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国家更加危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那么敬仰他，对他近些年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表同情，对蓄意诬陷他的那帮乱臣贼子深恶痛绝。在举国悼念这位劳苦功高的伟人之际，我怀着真挚、深切的惋惜、悼念之情，填了几首词，其中两首调寄乌夜啼充分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和感受：

环宇人神共泣，江山咽，一代风华遽尔长相别。才称雄，气贯虹，功盖月，巨星光华万古永不灭。

麟凤何处寻觅？思心切，梦魂几度墟官谒英烈。忆斯人，添豪情，涌热血，故国多情悲痛化钢铁。

不幸接踵而至，7月6日朱德元帅逝世。大家知道，朱老总在“文革”中受了不少气，被诬为“大军阀”、“有野心”。对这位建军元戎、红军之父，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我们当过兵的人都极其崇敬和怀念，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当时我也有诗悼念：

巍巍江山一千城，开天辟地老元勋。
扁担一根挑北斗，草履两只镇乾坤。
耿耿赤心昭日月，浩浩正气咤风云。
社稷尊崇星未落，贤将丛中耀英名。

工农造反仗戎马，辗转沙场几一生。
旗举昆明死袁酋，炮响南昌育红军。
游击八载逐倭寇，运动三年灭蒋兵。
首帅谢世中华恸，再览凌烟忆功臣。

7月28日突然发生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伤亡巨大，损失惨重，这无疑使根基已发生动摇的共和国大厦更加雪上加霜。古人云，国有大灾大难，必现山崩地裂巨风海啸等不祥之兆，定有妖孽为害四方。7.9级地震乃大凶，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坏，是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至于妖孽，林彪、江青之流便是，他们早就在中国大地上兴风作浪、为非作歹了。天灾加人祸，中国人民焉得不苦！

这一年的9月9日，毛泽东主席魂归九天，噩耗传来全民悲痛，神州失色。当时我想，作为中国革命第一伟人突然谢世，是党和国家的最大不幸，其损失将无法弥补，这件事

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也不可预料。

神州一岁逝三杰，思之令我肺肝摧。三大领袖相继作古，中国这艘在茫茫夜海中的航船失去了舵手，会发生何种意外？党和国家将何所去？前途是什么？我迷茫困惑了，但在默默思索着。

上头通知，两天后中央将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追悼会，各单位都要组织收听。后勤党支部书记张清钧找到我，要我为毛主席逝世写副挽联，收听时会场要用。我接受了这项光荣任务，回家琢磨了半天，拟了一联，内有“珠峰”一词比喻毛主席的不朽功绩高过珠穆朗玛峰。经党支部审查认为可用。没想到保卫干事庞××居然称此联有问题，“珠峰”是何含义要好好审查、追究。庞去找军代表，硬说“珠峰”就是“猪疯”，是影射攻击。军代表老孟还有点水平，看过挽联说没什么问题，才未拿我是问。

“文革”中，庞某带头造反，上窜下跳，煽风点火不遗余力；继而又造谣中伤，陷害同志；学校革委会成立后他执掌保卫大权，整人成瘾，像只猎犬到处刺探“反革命事件”，被人称为“克格勃”；他还以“在墙上书写反动标语”为由，亲手将一位老专家正上小学不满

十岁的外孙打得尿血，双肾严重受伤，成为终身残废。凡此种种，使庞某在校恶名昭著。

1976年，长春市有人以“祝寿哉”笔名散发传单，对“文革”中大搞“三忠于”、“四无限”的个人崇拜活动表示反对。此事被省市革委会定性为“恶攻”，要求全力侦破，各单位都要“梳篦子”、“过筛子”。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此传单究竟是何人所为？上面分析了个范围，通知各单位照此严查：三四十岁年纪，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爱好文学，有一定古文基础，“文革”中本人或亲属被斗，对“文革”、对毛主席怀有刻骨仇恨。这些条件我大多具备，于是那个庞“克格勃”又将我列为怀疑对象，有好心者偷偷将此情况告我，嘱我小心。我心中有数，自然泰然处之，不为所动。不久果然将书写、散布“反动传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原来是个名叫史云峰的青年所为。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为此大动杀机，竟一不作二不休，不顾革委会成员、原长春市长陈钟等许多革命老干部的劝说和反对，悍然决定将史枪决，这是当时长春妇孺皆知的一件大事。粉碎“四人帮”后，史云峰得到昭雪，和张志新一样被定为烈士。史被杀害后，其尸体由医科大学收作教学用。当时负责保管

尸体的医大解剖教研室一位同志对史深表同情，秘密地将其尸体妥为保存，直至史被昭雪后，史的母亲被告知史的遗体在医大才得以确认领回，隆重安葬。那位保存烈士遗体的同志的义举，博得烈士家属和广大群众的一致赞扬。我极其佩服史云峰这样勇于为捍卫真理、反抗谬误而献身的大无畏斗士，他是真正的反潮流英雄，压不垮打不烂的真金纯钢！

1976年清明节首都人民因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事件，更使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寒流滚滚，空气令人窒息。我们这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更是噤若寒蝉，不敢流露半句不满，只是在沉默中偷偷地传看手抄本或油印本《天安门诗抄》，从内心对勇敢的北京市民的壮举十分钦佩，对小平再次落难深表同情，对这种镇压群众的做法满怀义愤。

有句人们在“文革”中常引用的鲁迅先生的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是的，人们在沉默着，思考着，酝酿着。中国大地万马齐喑，神州上空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长夜，何时方是尽头？十亿人民盼望天亮。

历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关头。

1977年5月初，学校医院革委会苏副主任对我说，医院搞科研需用麝香，西藏有货，问我能否通过关系去买一些。买药材非我职责，但有两个因素促使我动心：一是去西藏必经成都，我可以返川看望久不见面的兄嫂，二是向往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便答应试试。给大哥去信询问此事，不久他回信说，经托人找关系，有位在成都休假的昌都地区革委会黄副主任答应可以考虑。于是我便于5月10日乘飞机

到成都。行前苏副主任向我许愿说，为了办事方便，可以请有关同志吃饭；出差费标准不够，超支了回来可给予补助。

经人引荐，我到西藏驻川办事处第三招待所拜访了黄副主任，说明来意，请他帮忙促成此事。黄随十八军入藏，是位老干部，典型的军人性格，说话痛快，对我也很热情，介绍说：昌都地区出产不少名贵药材，如麝香、天麻、贝母、冬虫夏草等，其药材产量占全藏的百分之七十，其中麝香年产达数百斤，既是搞科研用，可以适当解决，同意我去昌都。

开局很顺利，办好有关手续，买好去昌都的汽车票，我便于6月4日上午10时离蓉，开始了去昌都的长途旅行，估计走川藏路必有一番艰险。

第一个险要去处，是号称“天险”的二郎山。“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只有身临其境，方知这歌词并非过分夸张。论海拔此山不过三千多米，但因其处处悬崖绝壁，高山深谷分明，故尤显雄伟险峻。当年筑路大军用汗水和鲜血在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汽车盘旋而上，越走越高，越走越险，路窄，多急弯，若两车相遇，一车必须先停下来让对方通过。这段路常出事故，不断有

车毁人亡事件发生。途中所见，一边是怪石嶙峋、高不可攀的山峰，一边是深不见底、壁立直下的深渊。远方层峦迭嶂，山山相连，常有白云在峰顶缭绕，许多山头忽隐忽现，若与天接。古人云：“登泰山而小天下”，如今，却有攀二郎忽近苍穹之感。行至高处俯瞰山下，公路犹如细带，汽车仿佛玩具，足见其高。同车许多人虽是到内地休假后返藏工作的“老西藏”，在这条路上走了多次，仍感心惊肉跳，有的紧闭两眼不敢看车外。过山之后，大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互祝平安。

下午抵泸定，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泸定铁索桥。大渡河水波涛汹涌，河深水急，宽近百米，十几根粗大的铁链架在两岸。桥两边都有桥头堡，左岸堡门上书有“泸定桥”；右岸堡门后有一纪念亭，书“红军桥”，纪念当年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历史功绩。站在桥前良久，详加观察、思索，更知当年战斗之激烈，更加感受到红军英雄所建立的殊勋。大渡河水浪滔滔，两岸凌空悬铁桥。一战破敌建巨功，红军威名震九霄。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子孙，切切不可忘了烈士的鲜血，切切不可忘了泸定桥！

接下来的几天，汽车经过康定、道孚、炉

霍、甘孜、德格。这一带都属牧区，牧草肥美，溪流众多，不时遇见成群的羊、马和牦牛，河谷中、山脚下零星地散布着牧民的流动帐篷，公路边的藏民向我们招手、伸舌表示欢迎，有位十多岁的小姑娘甚至跳起舞来。

从泸定到德格，我们又翻越了折多山和雀儿山。过折多山，虽也艰难，毕竟有惊无险，但过雀儿山却遇到了麻烦。刚下过一场大雪，这山简直成了冰雪世界，银砌玉琢，晶莹剔透，道路全被雪封，积雪厚近一米，汽车无法行驶。无奈，只好待在山下耐心等候。所幸为时不久，路上积雪已被道班工人用推土机清理完毕，我们才得以继续赶路，翻越雀儿山。路很滑且不平，汽车喘着气缓慢爬行，有时像扭秧歌一样跳动摇晃。到了险要地段，左是千仞深谷，右有随时可能塌方的危崖，司机更加聚精会神地操纵汽车，乘客们提心吊胆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行至一处，前面有一大块从山上滚下来的积雪挡在路上，车绕了一下过不去，右前轮已碰到了雪块，而左边是望不见底的悬崖。司机助手建议“冲过去”！但经验老到的司机说：“冲？那还不翻下去！”乘客们都恐慌地要求先别开车，把那雪块挪开再走。于是大家下车将那雪块搬到一边，再登车前行。

雀儿山海拔近六千米，汽车到达的最高处也有五千米左右，空气稀薄，气温陡降，乘客们都纷纷添加衣服。有人因缺氧引起呕吐，几个孩子难受得哇哇直哭。过前几座高山我都无不适之感，这时却有了反应——眩晕，气短，淋巴疼痛，心速每分钟达九十次，直到开始下山才逐渐缓解，庆幸自己又过了一难。唐僧西天取经遇了八十一难，谁知前面还有多少难！这真是劳累的一天，惊险的一天，领教了旅途的艰辛和缺氧的滋味。

从四川西北部最边远的县城德格行车一小时，即抵达金沙江边。经过两岸边防检查站验证后进入西藏。大雪山渐渐多起来，此伏彼起，穿行于大山之间好似置身水晶世界。大小山头形态各异，若人像，若鸟兽，若器物，百态千姿，蔚为壮观。赤日、蓝天下，白云、银山、红土、绿草、黑牛，好一幅美丽画图，真令人为之倾倒。

经过整整长达六天的奔波，行程近一千三百公里，途经两个省、四个地区、十五个县市，于6月9日抵达了目的地西藏重镇昌都。

次日到地区商业局，见了张副局长，将单位介绍信交给他。张是位藏族干部，热情地向我表示说，“你这么远来，一定尽可能帮助解

决”，并要我安心住下，等他请示一下地委再具体答复。

我住在商业局招待室，等候答复。等了几天，催问过几次，都说地委领导很忙，还未来得及研究。无奈，只好耐心再等下去。每天很无聊，除照例到邮局门前的阅报栏看报外，便到全城各处闲逛，认识一下地处边远的昌都面貌。

昌都是西藏第二大城，海拔高度三千二百米，位于两山之间，东西宽约一公里，南北长三公里许。格尔吉河和鄂穆楚河在城南汇合后称为杂楚河，入云南后名澜沧江。整个城市由鄂穆楚河分为两半，由东西两座大桥连接起来。东面为居民区，房屋大多简陋破旧；西面为机关、商业区，是前些年推平山坡后新建的，比较整齐漂亮。全城人口约五万，相当于内地一个中小城市，居民绝大多数是藏族。商店里东西不多，除当地土特产品、手工艺品外，可买到内地生产的真丝被面、毛线、烟、糖和生活日用品。著名的帕巴拉·格列朗吉活佛原所在的喇嘛寺，就在城内一座小山上，但“文革”中被当成“四旧”彻底毁掉，只剩残垣断壁。宗教信仰，是无法用行政命令或暴力手段所能禁绝或倡导的。作为中国特殊区域的

西藏，喇嘛教已深深融入这块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藏民信教。“文革”中可毁寺庙，但菩萨却留在藏民心中。此次入藏后，沿途常见路边、岩上、河旁不断有彩绘的画像及各种图案，从大到小叠在一起的石堆，和飘扬的经幡，那就是藏民的一种精神寄托，是他们心中无比尊崇的神祇，是任何力量也驱不掉的。

光阴，就这样被我在每日的游逛中度过了。过了半个月，张副局长有天来找我，高兴地说，地委考虑到我这次长途跋涉到昌都求购药材，很辛苦，同意适当照顾，售给我三两麝香和部分我认为单位需要的其他药材。一次购进三两麝香，对内地所有用户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我回单位也能够交差了。但我仍不甘心，想多买些回去，便请张再作点努力。张说，三两够多的了，还是争取来的，一般都不予解决。要满足我的“贪心”，看来很困难了。

当晚躺在床上，想来想去，决定单独去找一下昌都地委管财贸的张副书记，作最后一次努力。次日一大早起床匆忙用过早餐，我便直奔事先打听好的地委大院，问清张副书记住所后，便赶去硬着头皮敲门。一个年近五十身着中山服的高个男子为我开门，客气地让座，他

就是地委张副书记。我作了自我介绍。张说：“噢，我知道这事，你从东北来买麝香。不是已经解决了吗？”我说：“是批了三两，但少了一点，请地委照顾我们科研的需要，再多少批一些，比如能否增加为半斤。”张一口回绝：“不可能，不可能。昌都地区是出产麝香，但这是国家重要出口物资，批给你三两已经不少了。”这时，我这个不善言谈和交际的人，不知怎样突然来了灵感，竟脱口而出：“张书记，我从东北来到西藏，不远万里，历尽艰辛，很不容易，真好比唐僧师徒西天取经了。我们单位急需买点稀有药材进行科研工作，请地委无论如何给予支援，来西藏取了‘真经’，我个人回单位也好交差了。跑这么老远，花了两个月时间，要是任务完成不好，多遗憾。”听我这一番发自肺腑的恳切言辞，这位来自山东的援藏干部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表示“再研究一下”，口气有了松动。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地委领导最后同意给我半斤麝香，外加二十斤贝母，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满载而归了。

极为宝贵的“经”被我从西天取回来，医院上自领导下至医生和药房工作人员都感谢我，称赞我，说没想到能搞半斤麝香回来，这

下可解决了大问题。称赞归称赞，可是对我这次为时两个月的出差期间多达四百元的亏损，当领导的却只字不提，苏副主任已将事前对我的许诺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直到1979年我被平反，为我补发了工资，才将这四百元欠款补上。正是：公家得实惠，个人吃大亏！但我并不懊恼，因为西藏之行我有另外的、花钱买不来的收获。

从1966年落难起，我潜心修炼十余载，即将修成正果。但命中注定，只有西天取得“真经”归，才能算功德圆满，飞升“仙境”。

17

重见天日

物极必反，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条不可动摇、屡试不爽的铁的规律。1976年10月6日，北京炸响了一声春雷。天终于亮了，作恶多端、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倒台，女皇美梦成空，巨帚将阴霾一扫而净，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进入了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久处桎梏中的中国人民欣喜若狂，唱啊，跳啊，一次再次地雀跃欢呼，庆祝国家得救、人民新生。“罪人”们的心情更非语言所能形

容，我们十分清楚这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期盼早日砸碎身上的枷锁。

为平反冤案，早在粉碎“四人帮”前的1972年，我就曾赴京到中央信访办上访，也回学校找过革委会负责人，连同寄给各级的申诉信共达二十一次之多，但都石沉大海，那时还不是我们这些“罪人”说话的时候。现在改天换地了，那些颠倒是非、制造冤假错案的人已被押上历史审判台，该还我们以清白之身了！

果然，不久党中央就把平反工作提上了日程，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做这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大事，时为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抓得很紧。学校也专门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进展很快。我们信心倍增，满怀希望，翘首以盼，恭候佳音。

1978年10月，在学校召开的落实政策大会上，正式宣布为爱忱平反，推倒强加于她的不实之辞，恢复党籍。不巧的是那时我们正在北京参加中央教育部党组为“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父亲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无法参加这次在全校引起巨大轰动的大会，去感受那振奋人心的气氛。事后据与会同志介绍，当领导宣布为爱忱平反时，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

声，不少人都说这才是真正落实党的政策。可见人心之所向。

其时，全国正深入开展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场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重大斗争是全党全国关注的焦点。

很快就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加快了。这时，我再次鼓起勇气给学校党委写了申诉材料，并直接找了党委书记，要求尽快复查我的问题。

书记说：“看来过去对你的问题定性定错了，处理也过重。不过你也有错误。”

“什么错误？”我很茫然。

“那时你不该反对江青和张春桥。”

“为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说：“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是政治局委员嘛。”

书记的“高论”使我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位“文革”中备受摧残，同我一起蹲过“牛棚”，现又重新担任学校重要工作的领导干部，竟然有他自己独特的逻辑，讲出了如此荒唐可笑的混话，真是岂有此理！

为了早日得到平反，我直接给中组部写信申诉。中组部很快将此信批转吉林省委，要求

按政策尽快复查，又由省委批到学校，看来学校不办不行了，此事终于提上了日程。

平反我的冤案，阻力重重，人为地设下了道道障碍。“文革”中处理我的问题，是学校报经市革委会保卫部批准，现在复查平反，同样还要经过市公安局审批这道手续。学校上报后，迟迟没有结果，问落实政策办公室，说当年市革委会保卫部批准将我定为“反革命”时，是一位姓战的负责承办，如今要为我平反，还须经战某办理，他仍在公安局搞“三案”复查，这种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自然颇费周折。

战某曾对学校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说过：“对帅雪晓的平反要慎重，他的问题过去我了解（不打自招），性质怕不能轻易改。作为一个中层党员领导干部，他应该狠触自己的灵魂。”发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那位秃帅摔死温都尔汗多年后，仍有人拾其余唾当作打人的金箍棒，足见林彪阴魂不散，“文革”流毒之深。

我请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同志转告战公安：“按中组部规定，他是没有资格搞‘三案’平反工作的，应该回避。要是他敢于在我的平反问题上再设阻力，我要到省委告他！”



作者夫妇获平反后合影

此话传给战某没有，我不得而知。不过没过几天，这位战公安却主动到学校找我，提出要同我“谈谈心”。一见面，战某出乎意外地热情，满脸堆笑，隔很远就把手伸过来使劲同我握手，而且还给我戴了高帽子，美言不断：“老师同志，你在那个时候就看出了‘文革’中那么多的问题，敢于说真话，说明你路线觉

悟高，有水平。”我听后感到阵阵恶心，答道：“那个时候许多人都看出了问题，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好多事情很不满意，只不过没有公开讲，或者讲了以后没被抓住，要不然也会跟我一样当‘反革命’。”战问：“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说：“我现在是度日如年，望眼欲穿，巴不得早一天解决问题。”他说：“你放心，很快就会批下来。”

后来才知道，就在战公安对我平反问题态度消极、拖延不办的时候，省委召开了“三案”复查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要求加大平反工作力度的指示精神，战某迫于形势压力才被迫转弯，坐不住了，态度也不得不积极起来。此人尚不失为“识时务者”。

瓜熟蒂落，说快也快，没过几天市公安局就批准为我彻底平反。1979年3月21日，学校召开落实政策大会，由那位曾对我说“那时你不该反对江青和张春桥”的党委书记亲自宣布为我平反，撤销“文革”中对我的错误处理决定，恢复党籍和原工资级别，参照原职务重新安排工作。

大悲之后是大喜。在当了整整十年的“现行反革命”，身心备受摧残，大好年华付之东流后，历史终于宣判我无罪，被颠倒了的是非

重新被颠倒过来，我又回到了党的温暖怀抱。一时涕泪交流，情不能禁，吟就《重逢》一诗，献给亲爱的党，献给我那惨遭江青之流毒手迫害致死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也献给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同志亲友，并自勉：

儿离慈母整十秋，母子失散几多愁！
血雨腥风残黎庶，黑地昏天黯神州。
母卧病榻命悬悬，儿系冤狱魂悠悠。
千古浩劫理何在？留待史家论因由。

七六中兴荡寇仇，骨肉重逢喜心头。
母去沉痾伤初愈，儿焕青春愿已酬。
九死一生志弥坚，千锤百炼质更优。
裹创再战奋余勇，漫漫征尘识风流。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全家几乎人人都遭受冲击，无一幸免，父亲被迫害致死，兄嫂、弟弟、我们夫妻或被打成“阶级敌人”，或被定为“犯了严重错误”，连子女亲属也备受株连。粉碎“四人帮”后，蒙党中央广施甘霖，落实政策，才逐步得到第二次解放，到为我平反，全家都获得昭雪。回忆1969年元月在“牛棚”时曾吟《满江红》，十年一觉换了

人间，心潮难平，再赋一阙，两情对照更增添
无限思绪：

沉冤十载，
昭雪矣，
满门春光。
迸热泪，
喜舒双臂，
慷慨激昂。
珠峰翩翩舞神女，
明月娓娓唱吴刚。
我父子兄弟与夫妻，
沐朝阳。

党中央，
施甘露；
小平公，
拯沦亡，
辨谁个奸佞，
谁个忠良。
逆浪千里增教训，
征途万代戒荒唐。
看松竹霜欺雪压后，
更刚强！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我和爱忱又重新开始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到医院仍干老本行。爱忱被落实政策后，安排到学校党委办公室负责为别人落实政策，对于受过委曲的她来说，由于感同身受，她更能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更对翘首以待重见天日者具有同情心，上任后耐心接待来信来访，不断奔波调查核实，工作很有成效，为不少像她过去一样渴望落实政策的人办了许多实事，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被落实政策者的一致称赞。

我们的女儿考上了大学，积极上进健康成长。

沐浴在明媚的春光里，一切都显得那么舒心、惬意，我们全家都忘我地工作、学习着，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18

替父申冤

父亲帅昌书（又名帅如先，后改名丁华），早年投身革命，是个职业革命家。1926年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曾中断学业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任营政治指导员。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毅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担任中共四川眉山县首任特支书记。1931年后在南京、上海参加“全国互济总会”工作，创立“左翼教育工作者联合会”，历任“左翼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中

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组织干事、宣传干事、总务、党团书记，“全国救国会”党团书记，党的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1935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难友中的共产党员们在狱中组成党支部，“文革”前任中央纺织工业部部长的邓洁为支部书记。难友们在党支部领导下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的刑讯逼供下坚守党的秘密，拒不承认自己的政治身份，保护党的组织和战友。后中央为了抗日大局，指示被捕党员可以有条件地满足国民党的要求，承认党员身份，出狱抗日。

1936年，父亲获释后回到成都，同车耀先等一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成都文化界救亡协会任执行委员。不久后到重庆，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任指导部主任和晓庄研究所秘书长。

1941年，周恩来同志请钱之光同志约父亲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谈话，宣布两条决定：一、父亲1935年被捕一事，经组织审查，认为在狱中表现是好的，中央决定恢复父亲的党籍。二、由于父亲的政治身份暴露，不便继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决定他到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工作。

同年，父亲经香港赴江苏盐城，任盐城中

学校长、淮海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和淮海区党委党校秘书长。1943年赴延安，到中央党校二部学习，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支部书记、秘书长、党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委员。全国解放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文委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央人事部三局局长、高等教育部党组成员和部长助理等职。

1967年，在江青的授意、煽动下，全国掀起一股“抓叛徒”的妖风，首当其冲的是抗日战争前夕在北平被捕的党的北方局成员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刘澜涛等一批共产党员。父亲1935年曾在上海被捕，因而也在劫难逃。当时他患帕金森氏病，正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长期卧床不起，丧失了工作和生活能力。既是“叛徒”，自然没有资格住高干病房，很快就被造反派赶出了医院。失去必要的治疗条件，病情日益恶化，1969年2月13日终于含冤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理所当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党中央要求尽快进行清理落实。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主持这项空前复杂、困难重重的工作。尽管阻力很大，但毕竟坚冰已打破，航道已开通。中央的

方针深得人心，万民翘首以盼。

我们全家自然更为关心这件大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蒙冤十载的父亲应该获得昭雪了。继母曾玉春、弟弟毅生、弟媳周嘉澄住在北京，上访较为方便，他们多次找组织申诉。毅生曾去找一位鼎鼎大名的理论权威、曾与父亲一起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同志，想探探他的口气。因他在中央影响大，当时已经重新担任重要领导工作，可能比较了解党的政策。毅生问他：“我父亲是中央管的干部，为什么五七干校能推翻过去中央给我父亲作的结论？我想不通。”不想这位理论权威态度十分冷淡，竟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说：“有什么想不通的，田汉过去没定叛徒，不是一样给他定了吗！”

但他的这盆冷水并未浇灭我们心中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我们觉得理论权威的话只能证明他的思想认识还远远跟不上形势，仍处于僵化状态。我们坚信，父亲是清白的，党中央一定会实事求是地解决父亲的问题。

不久，在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做出决定正式为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平反昭雪，推倒强加于他们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

我们感到为父亲申冤的时机更加成熟了，

应该正式以遗属的名义向组织提出申诉。除了毅生夫妇到处奔波，找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反映情况外，由大哥雪樵执笔向党中央写了一份申诉报告，继母和兄弟四人签名，并附上具体的有关材料，由毅生送到胡耀邦同志手中。

1978年3月9日，毅生来到耀邦同志家递交申诉报告。耀邦同志正接待一位上访者，送走客人后问毅生有什么事。毅生说：“我是丁华的儿子，来找胡部长递交替父亲申诉的报告。”耀邦同志极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地说：“啊，丁华同志，我们很熟。”五十年代，父亲在高等教育部工作，连续多年都担任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主任，与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耀邦工作上有过接触。毅生随即递上申诉报告，耀邦很快将报告看了一遍，说：“这件事情会认真处理。”并立即提笔在报告上批示：“请教育部党组抓紧复查”，并签上名。毅生问：“胡部长，我父亲的问题能否尽快解决？”耀邦答道：“经过我这里的问题要排队，不可能太快，三个月吧。”毅生一听，三个月就能解决，那真要谢天谢地了。

经耀邦同志批示的申诉报告转到教育部后，部党组高度重视，态度积极，复查工作抓得很紧。罗叔章阿姨写的证明材料极为有力，

她证明父亲 1935 年在狱中表现是好的，保护了组织和同志，曾设法带信给她，通知她立即转移，因而避免了被捕的厄运。

教育部党组根据充足的证据，很快对父亲 1935 年在上海被捕一事做出了相应结论，上报中央，6 月 9 日政治局批准，决定推倒“文革”中所作的错误结论，为父亲平反昭雪，还他以革命者的本来面目，并举行遗骨安放仪式。

全家欣喜若狂，压在头上的一块千斤巨石终于被搬掉了，我们从内心感谢党中央的英明正确，也由衷称赞胡耀邦同志锲而不舍狠抓落实政策的大无畏精神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从耀邦批示到组织做出平反决定，刚刚三个月，耀邦同志真是言必信，行必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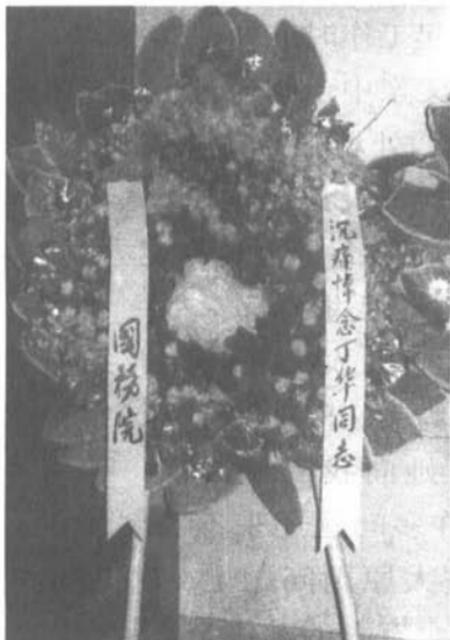
1978 年 8 月，应教育部落实政策办公室之邀，我们兄弟姐妹和下一代齐聚北京，参加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仪式于 1978 年 10 月 25 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到会的有父亲生前友好、同事、学生共五百来人，实际上是补开的追悼会。想当年父亲被迫害致死时，家里连他的骨灰都不敢保留，怕有“划不清界限”之嫌，竟使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父亲死无葬身之地，说来令人心酸。如今要安放骨灰，从哪



1978年10月25日中央教育部在北京八宝山

革命公墓为父亲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里去寻？无奈，只好按中组部有关规定，取父亲生前穿过的一件衬衣和他的一枚图章放在骨灰盒中代替。骨灰盒存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放骨灰盒时我们看到康生的骨灰盒也在



国务院送的花圈

问题受到多大牵连啊，我和哥哥自不消说，弟弟为此而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离开部队，侄女不能入党，总之广受株连，全家皆黑。现在好了，我们全家可以抬起头来堂堂正正做人了。

处理完父亲的事情，全家人去看望了他生前的一些战友。

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与父亲同是1935年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1950年又一起访问苏联。我们去看他时，周尚未落实政策，话不多，对一些事情不便表态，只回

一室，但盒上覆盖的党旗已被取走，知道这个坏家伙也快被清算了。

父亲的问题解决得比较理想，他老人家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作为子女，我们也得到莫大的安慰。想当初，全家因父亲

忆了过去与父亲一起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阳翰笙叔叔是父亲中学同学，当时也未落实政策，居处简陋，处境艰难，但快人快语，不断骂江青，他既诙谐又讥讽地说：“我的问题归中央专案办管。什么‘中央专案办’，纯粹是江办！”我们听得很过瘾。

罗叔章阿姨是全国人大常委，老共产党员，她十分健谈，为父亲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感到高兴。谈话中，她向我们透露说，刚粉碎“四人帮”不久，许多问题还来不及解决，百废待兴，在有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党内还有斗争，可能不久中央会有大的动作，希望我们认清形势，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果然，很快就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国形势从此向好的方向发展。

赵世炎烈士之妹、李硕勋烈士夫人、李鹏同志的母亲赵君陶，与父亲是老战友，抗战初期同我父亲、车耀先烈士等在成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赵阿姨对我们十分亲切，她记忆力很好，还谈起1938年前后我们父母、兄弟的一些情况。

其他如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陈野萍同志，交通部副部长曾直同志，原民航总局政治部主任黄乃一同志等，对我们兄弟都慰勉有加。

当然，我们不会去看望那位思想僵化、态度冷漠的理论权威。若去看他，他反倒会尴尬万分。

父亲的历史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我在百感交集之余，突然忆起了一段往事。

1950年，中央组织部批准我和弟弟毅生到北京上学，就读于西直门大街的华北中学（毅生读附小）。分别十年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同父亲见面，见到我们兄弟，他极为高兴。那时父亲住在东四头条人事部宿舍，我和弟弟住校，周六晚上回家。华北中学不少学生都是高干子女，全部是供给制，高中毕业后经过一年俄语补习，基本上全部派往苏联、东欧接受高等教育，看来我的前程相当光明美好。

这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1951年夏国家号召广大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一时间校园沸腾了，满怀爱国之心的学生们踊跃报名从军，誓赴国难。我也积极报了名，但没有告诉父亲。报名很快就被批准，心想：这下愿望实现了，我将到军校学习后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打击美国侵略者，战死了是烈士，活着回来就当英雄。

我很兴奋，很快给父亲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老人家。没想到父亲很生气，在电



话中对我发了火：“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一下！”他要我马上回家去一趟。

下午，我乘电车回到家，公务员说父亲已吃完饭到部里开会去了。他到机关食堂为我买来饭吃过后，我等到8时仍不见父亲归来，心想明天还要参加北京市为全市参军学生举行的欢送大会，急于赶回学校，于是，给父亲留下一张纸条便返校了。

离开华北中学赴军校那天上午，参军的几十个同学胸前戴着大红花，整队出发。刚出校门，就见外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我知道父亲赶来了。果然，父亲走过来，送给我一本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纪念册，对我说：“既然组织批准了，你就去吧，到了军校要好好学习。”匆匆道别，来不及多说几句话，我们便登上军校派来接学员的汽车，高唱着当时很流行的《共青团员之歌》等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到了军干校。

事后听说，父亲对我辍学参军一事很失望，作为学教育、管教育的父亲，一生以培养人才为己任，育才爱才，千方百计要使学生、子弟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人。他的想法是：他们那代革命者是打江山的，我们这代年轻人是搞建设的。我从小就得到父亲的宠爱，

他认为我聪明，定能学有所成，对我寄予厚望，没想到我会使他的愿望落空。当然，在当时形势下，对于我响应国家号召投笔从戎之举，父亲也能理解。

后来，亲友中有人为我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而惋惜，有人问我是否后悔。我想，路是我选择的，虽命运不全由自己掌握，但青春无悔！我只是十分怀念父亲，感谢父亲，也理解父亲。

1959年，父亲到鞍山市汤岗子疗养院疗养。我到北京出差返长春时，转车到汤岗子看望父亲，陪他老人家住了一晚。虽然说是父子，但因分别太久，我五岁多父亲就去了解放区，直到解放后才到他身边，我对父亲的许多方面都还不了解，在晚饭后散步时便打听他的一些往事。机会难得，这是我们父子间一生中少有的谈心。他谈了自己经历中的一些事情，如读大学时晚上躺在床上，入睡前还要用段时间以手指在肚皮上划英语单词，以达到熟练程度；去解放区的路上，被敌人穷追不舍，他在前面没命地跑，摆脱敌人后几至瘫倒；在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中央机关干部都有生产指标，他由不会到会，最终完成了手工纺纱的任务；他与一些同志常去看望帅孟奇大姐，帅孟

奇大姐每次都热情亲切地接待他们，还煮鸡蛋给他们吃；1948年从延安撤退时，父亲担任中央机关一个大队的大队长，他们如何做到有组织有序地安全渡过黄河撤至山西、河北、西柏坡……

在这次谈心中心，父亲谈到的两件事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一是父亲刚到延安不久，一日晚饭后散步时，碰见毛主席同江青也在散步。父亲以前未见过主席，江青为他们作了介绍。我问父亲怎么认识江青的，父亲说：江青30年代初当过小学教师，是共青团员，1935年在上海参加了“左翼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父亲是教联创始人和党团书记，所以同她熟悉。父亲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叛徒“老莫”出卖，江青被捕，叛变自首；也因“老莫”出卖，父亲不久也被捕入狱。更令父亲想不到的是，刚解放，江青就说父亲的坏话：“丁华历史上被捕过，不可重用。”到了“文革”，江青对了解她过去的人（包括父亲在内）都毫不留情地痛下毒手，父亲也惨死于这个毒妇的手下。

第二件事是父亲深情、崇敬地谈起周恩来总理。他说周总理精力过人，细致严谨，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晚都要工作到次日凌晨

两三点钟。有天夜里十二点过，父亲已经入睡，总理秘书打来电话，说总理请他立即去一下。父亲赶快起床，赶到总理办公室。总理说：“丁华同志，今年高等院校招生计划我看过了，有个统计数字是否有差错，所以请你来把情况弄清楚。”父亲接过高教部呈报的材料，发现果然有个数据有错。父亲说，你看，连统计表中不起眼的小小一个数字，总理都认真地审阅并发现了问题，这种精神、这种工作作风，多么可贵！后来父亲因病不能坚持工作了，曾给总理打电话：“报告总理，我因病久治不愈，已不能上班，请组织减发我的工资。”周总理回答说：“丁华同志，你是一位老同志，有病该休息就休息，原工资照发。”

父亲可亲可敬，周恩来总理更加可亲可敬！

19

归 去 来 兮

党的政策如阳光普照大地，似春风吹遍人寰，全家人的冤假错案接连获得平反昭雪。在喜悦、激动的同时，我很自然地会回过头来看“文革”。

十年浩劫，一场噩梦，是党、国家、人民的一大灾难，损失几何？政治上颠倒是非，混淆敌我，自我毁灭，多数干部、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百姓遭殃，家属亲友广受株连，打倒了一大片，那些一心要打倒别人的人最后连自身也不保。野

心家阴谋家应运而生，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大捞好处，党的优良传统、国家法制纪律和社会道德破坏殆尽。人性被扭曲，派性恶性膨胀，群众之间严重对立，一家人往往因观点不同而导致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冤假错案比比皆是，至于心理创伤更是难以治愈。生产遭破坏，国家经济濒于崩溃，却还要吹嘘“到处莺歌燕舞”，自欺欺人。总之，“文革”造成了国家大破坏，社会大倒退，其恶果罄竹难书。

当然，中国共产党勇于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正是她的伟大之处。对“文革”的沉痛教训，党前些年已作过深刻总结，这见诸于党的决议、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报刊文章中。没有这种认真总结和深刻反省，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这已成为共识。

作为“文革”受害者之一，我一直抱着“朝前看”的态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和冷静的。党和国家遭受那么大的损失，全国人民吃了那么多的苦，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和贡献良多的革命老干部受到那么大的伤害，许多人被迫害致死致残，自己不管怎样总还捡了一条命，活过来了，算是幸运儿。我会摆脱个人角度、抛弃个人恩怨，从大局出发去观察形势和做出判断。我绝不会怨天尤人，陷入无休止的

愤懑和怨恨中。我曾为民族的历次重大灾难而扼腕长叹，我更会为国家的兴旺发达日趋进步而自豪而欢呼并为之奋斗。我以及同我一样曾蒙受冤屈、深深感受“文革”切肤之痛的所有共产党员一样，会“揩干身上的血迹，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战斗”，哪怕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中国要富强，历史要前进，未来无比美好。但是，在前行的征途中会有失误甚至失败，会有曲折和反复，更会有牺牲。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倒是十分真诚地希望我们党以人为鉴，以史为鉴，常照“镜子”，作到“正衣冠”、“知兴替”，力求避免犯无谓的错误，少走弯路，少付代价，使我们伟大的中华古国永葆青春，重放光华！

但就我个人来说，“朝前看”是指理智地看待“文革”，并不等于什么都一风吹，对所有的人都容忍和宽恕。人毕竟是有七情六欲的，每当我忆起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创伤，心中就不免会蒙上一层阴影，唤起痛苦的回忆。尤其是看到或想起在大动荡年代拙劣表演过的那种卑鄙小人，那种造谣栽赃、落井下石、怀有野心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风派”人物，就感到深恶痛绝。对天真幼稚的红卫兵们的过激行为，包括动手触及过我皮肉筋骨的

人，我都能谅解，惟独对那些政治扒手，我绝对无法原谅，更不愿见到他们的尊容。

由于怀有这种感情和心态，我萌生了退意。不是退休（我才四十多岁，离退休还早着哩），而是撤退，调离东北，回故乡工作，叶落归根不失为上策。思考成熟，并征得爱忱同意，我正式向学校呈交了请调报告。校方也很通情达理，愿意放行。

1984年秋，四川省人事局同意接收、安排我们的工作，发来了调令。

即将离开工作了整整三十年的东北，告别几十年来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的战友、同事，难免不胜依依。很多要好的同志执意挽留，有的甚至流下真诚难舍之泪，令我感动万分。但我去意已决，尽管有分别的痛苦，我也决心离开这块大难不死之地，回天府之国那生我养我的故园，那里有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新的事业。

1984年9月，我们登上西去的列车。没想到，竟有一百多人到车站送行，令我们感动不已。列车启动了，我们向大家挥手道别，眼中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泪水，心里涌起别样一番滋味……

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已离开三十四年

的故乡，我的后半生将在这里度过。

回首往事，感慨良多。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共和国建立后所谓的“中生代”，既无打天下时在血与火中建立的显赫战功，又未逢当今改革开放年代赐予施展手足的大好机遇。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尤其是“文革”以前，虽然一直勤勤恳恳，忠于职守，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做人，但因政治运动频仍，不得不把尾巴夹紧，处处小心谨慎，特别怕犯政治错误，许多人的不幸遭遇已唤起了我的防范意识。但越怕犯错误，就越可能犯错误。批电影《武训传》，批“反动红学家”俞平伯，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资产阶级右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批彭德怀“反党集团”……当时我都有不同看法，有所怀疑和保留，但不敢稍有流露，总算比较平安地走过来了，窃以为喜。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实在憋不住了，说了一些真实想法，表示了自己对运动中发生的诸多怪事的不满与抗争，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犯了最大的“政治错误”，受到最严厉的党内和行政处分，就差没有被判刑了。一个被国民党政府定为“匪属”、被保长骂为“小共匪”的人，何以又变成“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我百

思不得其解。我，一名共产党员，一个政治工作者，几十年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整人乎？被整乎？有几多功过？几多荣辱？

毕竟，人间自有真理在，曾几何时，被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过来，真善美与假恶丑是不可能永远混淆的。多行不义必自毙，那显赫一时、坏事做尽的害人虫们，终于被历史所抛弃，1971年林彪一伙覆灭，1976年“四人帮”倒台，被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恶梦已醒，神州焕发了青春，东方巨人正重新站起来，挺胸朝前走。

作为曾为过去付出过代价者，想起半个世纪所走过的崎岖道路和失去的年华，在感慨之余应该给自己画个句号了。人的一生，就是一首悲欢交响曲，顺逆交替乃人间正道，正如伟大的文学家苏东坡所吟：“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尽管跌跌绊绊，但我总算走完了那段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可说问心无愧，无怨无悔，哪怕很不情愿地留下些许遗憾。我构思一联，来概括自己平庸的一生：

喻为战马功未竟
比作耕牛田不丰



为牛为马，尽力了，但成效不显著，于国于民奉献甚微，深感愧疚，遗憾多多。正是：坎坷路上风雨多，花甲年华叹沧桑。不愧惜韶华似水东流去，更翘首中华后生创辉煌。



1984年举家回到成都



情满天池

长白山天池位于中朝边境，为两国界湖，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历史上曾三次喷发，最近一次是在三百年前。天池面积近十万平方米，蓄水二十亿立方米，湖水幽深，最深处达三百七十三米。北侧湖水溢出成为一高达六十八米的瀑布，凌空而下，蔚为壮观，是松花江的源头。池周有温泉，水温最高达摄氏八十二度，可煮熟鸡蛋。周边高耸十六座山峰，最高峰白云峰海拔二千六百九十一米，终年积雪，



2001年9月同四川友人同游长白山天池

故名长白山。朝鲜族和满族，都视天池为其民族发源地，流传着一些美丽的传说。因其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如画的风光，天池成为有名的旅游胜地。

我曾有幸三游长白山天池，而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第一次是1982年秋，陪一位日本耳鼻喉科教授恩地丰游览天池，高成华同志充当翻译。

我们一行从长春乘火车至安图改乘汽车，在车上很惬意地欣赏着沿途风光：四周均山，林木茂盛，随着海拔的升高，植被不断变化，先是混交林，然后是针叶林，接近山顶几无树木，完全是苔藓地。高处路两旁生长着百年的白桦树，因长年迎风，都朝向山下，似向游人躬身致意。

山上有一床位不多的旅馆，条件不算好，我们被安置在这里住宿，下车后已觉寒气袭人。晚饭后无事，与恩地丰教授、高成华一起闲谈。这位日本教授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在世界医学界颇有名气。

次日早饭后，我们陪同日本客人饱览了天池美景。湖水清澈，群峰突兀，瀑布飞溅，令人心旷神怡，大伙都为天池独特的风光赞叹不已，也为能有此良机观赏长白天池而倍感欣慰。

第二次上天池是1984年春，与校外办主任李擎天等陪一日本医学代表团前往，仍走上次的路线。从安图下火车换乘汽车后的上山途中，代表团中一位女士忽然惊叫起来，说她随身带的一个手提包不见了，包内除有若干美元、日元外，还有护照，要真的丢失就相当麻烦了，为此她急得直哭。

我们都安慰她，帮她分析可能是遗失在火车软卧车厢里了。同时给安图火车站打电话说明情况，请车站帮助查找。我们相信，如果忘在火车上，是丢失不了的，铁路方面一定会帮助找到。但那位女士却很悲观，一路流泪不止，其他日方人员情绪也很低落。

刚刚上山住进宾馆，就接到安图车站打来的电话，说手提包找到了，是列车员清理软卧车厢时在卧铺上发现的。还说车站马上派车送上山，车已出发。

听此消息，日方所有人员立即欢呼起来，那位丢失提包的女士更是破涕为笑，高兴得不得了，甚至手舞足蹈。我方工作人员向对方表示，中国秩序良好，人民道德水平高，经常都有拾金不昧的故事。

正说话间，忽报安图车站送提包的车已到，我们都急忙迎出门外。只见一辆吉普车已停在宾馆门口，两名铁路工作人员快步走来，将手提包交到失者手中。

那位日本女士这时突然激动起来，先是向送还手提包的铁路同志深深鞠躬，然后泪流满面地说了下面一段感人的话：“谢谢！谢谢！我从内心真诚表示感谢！想不到，我丢失的东西竟这么快就找到了，而且中国铁路还专门派

人派车送到我的手上，我真要感谢友好的中国人民！”稍作停顿，她又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哥哥曾是侵华日军的一员，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行，感到内疚，不好意思来中国，要我代他向中国人民谢罪。我回日本后，将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我哥哥，而且会劝说他亲自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谢罪。”我们当即向她报以热烈掌声。当时，双方人员都为这场面感动了。

接着，女士拿出一些她带来的小礼品分赠为她找到提包的铁路工作人员和陪同代表团的我方工作人员。

在接下来的参观游览和返回途中，该代表团全体人员同我们更加亲密，欢声笑语不断。这是一次成功的外事活动。

一个提包失而复得的故事，演绎出一件增进中日友好的喜事。通过此事，我深感从事外事工作责任重大，所谓“外事无小事”，即此之谓也。

2001年9月，几位四川影友相约，结伴作东北之行，千里迢迢赶赴长白山，兴致盎然地游览享誉中外的天池。这是我第三次访问天池。与上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我们未乘火车，而是从延吉市直接乘汽车前往。同十几年前相



同原新化七队下乡知青陈常新合影

比，到天池的公路更加平坦宽阔，一色的水泥路面，汽车平稳地奔驰在这条五百里的绿色长廊上。时值初秋，层林初染，万绿丛中点点红黄，大自然又在进行着一年一度标志季节转换的色彩变化。亭亭玉立的美人松仍然那么优美、妩媚，迎接着万千来客。成片的白桦点缀林海，别具风情。不时有麂子、松鼠等大小动物穿越林间公路，使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更添生机。

早晨出发时天阴沉着脸，快到山顶时突然绽出笑容晴朗起来，风和日丽，凉爽舒适，老天似在特意眷顾我们一行，以示欢迎，这使大伙格外兴奋。



正当旅游旺季，游人如织，不仅有本地的，还有上海、四川、广东等地和韩国的客人。爬过一段陡坡，天池似一面明亮光洁的镜子呈现在眼前，湖水湛蓝，在骄阳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水波不兴，安静平稳地躺在群峰怀抱中。初睹天池芳容的游人如醉如痴，无不为了她的秀美所倾倒。连我这个阔别近廿载久违天池的老游客也再次被高山明珠的秀色所吸引，由于熟悉故倍感亲切，一往情深地注视着她美丽的身影。同来的影友们举着相机选择不同角度不停地拍摄这难得一见的湖光山色，携带摄像机的老王更是贪婪地摄下如画的景色。大伙游兴难尽，在山顶尽情饱览迷人风光，流连忘返，停留良久，才依依不舍地驱车下山，去观赏有名的天池瀑布。

这道瀑布由天池溢出形成槎河，瀑布口有一巨石名牛郎渡，将河水分为两股。有这样一首描绘瀑布的诗：

白河两岸景深幽，
碧水悬崖万古流；
疑是龙池飞瑞雪，
如同天际挂飞舟。
不须鞭石渡沧海，

直可乘槎问斗牛；
欲识林家真乐趣，
明朝结伴再来游。

明朝，我真愿再次造访天池，长久地依偎在她的身旁，徜徉在周围的原始森林中，尽情呼吸长白之颠特有的清新甜美的空气，听高山流水，观云海日出，在这梦幻般的仙境中任心往神驰，遐想万端，那才是世上一种别有风味的享受哩。



壮观的天池瀑布

21

红花似火

人皆有怀旧感，对一生中的难忘岁月总爱给予颇多的顾眷。延边地区五年的农村生活，长白山麓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是我们人生旅途中一段重要历程，弥足珍贵，因而也就回味无穷。尽管岁月匆匆，往事如烟，我早已叶落归根离开东北回到故乡四川，多年前的人和事在逐渐淡出记忆，但内心仍钟情于曾经的落难之处，深深怀念那里的土地、山水和朝鲜族乡亲，也想过有机会重游故地，再访延边。

1986和1990年，延边地区龙井市（原延吉县）干部金光同志两次出差经过成都，曾同我们见面。金是朝鲜族人，先后在县、市信访办公室和劳动局任领导工作，1973年相识于延吉县。金光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是非分明，对我们这对落难夫妻备加关照，过从甚密，遂成莫逆之交。他多次邀请我们抽暇去看看延边的变化。

恰好1991年春工作不忙，我和爱忱便提前休假，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奔向魂牵梦萦、心向往之的第二故乡。

金光同志对我们此行作了精心安排。他很了解我们此时的心情，到达龙井市的第二天就陪同我们一起赶往金钱沟，我们下放时所在的光新公社新化七队，现在叫新化乡七屯。

到了，这就是我们曾经劳动、生活过的山村！此刻，我浑身的血液仿佛沸腾起来，心砰砰地跳，放眼四顾，仔细辨认这里的一切。眼前的景物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触景生情，好像又回到了十七年前，六独河上原来的简易木桥已为新建的石桥所代替，跨过此桥不由得想起当年被洪水所困的情景，令人感慨万端。在村边，我下意识地在地里抓起一把土，抚摸着那棵高大的白杨树，贪婪地呼吸山区特有的

清新空气。

七屯的山林、农田、房舍同过去相比，并无明显变化，我们住过的那幢朝鲜族草房仍维持原样，甚至连当年使用的厕所也未挪动地方。现住户刘清白老人指着房前一株海棠树深情地对我说：“老师，这树是你亲手所栽呀，你看，现在已经长得这样高大了，年年都结果呢。”看到这碗口般粗、茁壮挺拔的果树，真有光阴如梭之感。

我们挨家挨户去拜访乡亲。“老师老卢回来了”的消息刹时传遍全屯，乡亲们纷纷赶来见面。“看，那不是朴长成、金今淑吗？”“啊，姜忠植老师也来了！”有人竟激动地抱住我们哭了起来，流出了喜悦的泪水，那场面实在动人。村里除逝去几位老者外，大多健在，一副副熟悉而亲切的面孔不断在眼前闪现。只是岁月的风霜在每人脸上刻上了难以抹去的印痕，昔日的年轻人已届不惑，彼时的成年男女如今已两鬓添霜。

金光拿出带去的酒和食品，乡亲们热情地杀鸡做菜，久别重逢，大家围坐在炕上把酒话旧，忆起当年一起春播秋收、抗旱防洪的往事。劳动中建立的深厚友谊，兄弟民族间的亲密情感，在这里再次得到体现和升华。

谈的更多的，是对如今美好生活的称颂和对未来远景的憧憬。改革从农村起步，农民自然成为最早的实践者和受益者。不是吗，你看各乡各村有多少草房变成了瓦房！农民屋里的摆设变了，缸里的粮食多了，七屯有些人家已购置了电视机和收录机，多种经营已在农村遍地开花，许多过去的困难户有了存款。他们满怀信心地说：“过几年你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日子比现在还要好得多。”爱忱回答说：“到那时我们全家都来，住在这里再不走了，咱们天天吃打糕。”这话引来阵阵欢笑。

酒助人兴，大伙又到院坝中跳起了朝鲜舞，翩跹柔美的舞姿，伴着优美动听的歌声，使我们沉浸在欢乐中，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真情享受。

四月底的延边，风和日丽，气候宜人，插秧季节又将开始。近处山上，美丽动人的金达莱花怒放，一团团一片片露出她的笑脸，点缀在苍绿的松树丛中。稍远一点的南沟山上，更是满坡红花似火，连绵起伏的长白山于宁静清幽中愈显妩媚娇艳，愈具诗情画意。江山婀娜多姿，这幅美丽的画图，正是延边各族人民意气风发的生动写照，也象征着伟大祖国繁花似锦的春天。

五一劳动节，金光又邀约与我们一同在新化下放的朝鲜族干部、原县政协主席方仪炫夫妇和市信访办诸同志，陪我们驱车作中朝边境之游。

是日天气格外晴朗，汽车行驶在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山花烂漫，图们江支流六独河在山谷间汨汨地流淌，布谷鸟儿用悦耳动听的歌声歌唱美好的春天。行程五十余公里，途经光新、白金等四个乡，到达图们江畔的三合镇南山。图们江是一条和平友好的界河，中朝两国真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两岸群山起伏，树木葱茏，景色如画。江对岸，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会宁郡和游仙煤矿区清晰可见。田间，农民正在辛勤耕作。

观赏完山景、江景和邻国之景，最后来到三合海关。一座钢筋水泥大桥沟通两岸，将两国联结起来，桥中间有一条绿色分界标志线。承边防检查站负责人允准，我们一行稍微跨过一点线界，站在朝鲜那一边，合影留念。我开玩笑地说：“总算出了一次国了。”

晚上回到市内，金光家设全狗席款待，新老朋友欢聚一堂。朝鲜族喜吃狗肉，以全狗席待客算是最高礼遇了。狗肉煮好摆上桌，瘦肉、肥肉、内脏分别装盘，佐以辣椒、酱油、



1991年春同朝鲜族朋友春游

味精、韭菜花、葱末、蒜泥、香菜等各种调料，极其讲究。狗肉味道鲜美，大家吃得津津有味，不断为民族团结干杯，千言万语道不尽兄弟情谊，千杯万盏浇不灭思慕之火，尽欢而散。

相见时难别亦难。长久分别后的重逢，无疑充满了抑止不住的喜悦和亢奋；而短暂聚首后的别离，又会带来巨大的痛苦与伤感。延边之行带给我们的，是欢乐，是振奋，是依恋，是思索。四川与延边相隔千山万水，路遥遥其修远，但却阻隔不断我们对那里的无限思念，图们江畔的友谊故事将永远流传。

我们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延边。春天的长白山生机盎然，金达莱花开放得愈发繁茂，愈加楚楚动人，漫山遍野火红，在和煦的春风里她摇曳美丽的身姿，露出

深情的笑容，喷吐清幽的芬芳，似在向我们挥手道别。此时，我浑身充满了亲切感和幸福感，趋上前去轻轻地抚摸她，亲吻她，仿佛已同这娇艳的花朵融为一体。我真愿化作金达莱，开放在长白山麓，直到永远，永远……

滔滔图们江水，
难洗净历史的陈迹；
绵绵长白山麓，
开不败美丽的花朵。
在春风里吟唱，
金达莱是江山巨变的赞歌；
在阳光下闪烁，
金达莱是时代燃烧的烈火。
你记录了民族深情，
你净化了人的心灵，
你见证了伟大与平凡，
你分辨了美好与丑恶。
啊，火红的金达莱，
你的故事流传千古，
我的一切都属于你，
而你将永远记住我！



后 记

我从未想过要写回忆录，一是个人经历中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和值得炫耀的功绩，平淡无奇，缺乏对读者的感染度和吸引力；二是要回避“暴露”、“伤痕”之嫌，文章写出来了，而批评、追究随之而至，何苦来！老都老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乐得清闲。

1998年，某出版社一编辑建议：“帅老师，你人生阅历丰富，现在又已退休，有时间，何不将一生中有意义的事情写点出来，相信

会有读者。”我想也是，我们这辈人经历了较多的重大事件，生活中有过许多欢乐，也遭遇过不少苦难，过去年代发生的事情，是当年轻人不了解而且也难以理解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晓历史对后人来说很有必要，作为事件的参与者有权利也有义务记录、评说自己亲历的往事，因而心有所动。

另外，“文革”结束后至今，描写下乡知识青年的文学作品为数可观，而出版以干部下放农村为题材的书则显寥寥。大家知道，“文革”后期下放到“五七”干校和农村的干部为数甚众，他们那一段的生活丰富多彩，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很有必要向读者作介绍，否则我们当代文学作品的题材将有所欠缺，而无法涵盖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生活、社会斗争的全部内容，这也是我不揣冒昧地想写点东西的一个原因。

后同一些朋友谈及此事，都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鼓励我提笔成文。几番思考之后，乃选择以“文革”后期流放长白山麓四载务农的情况为主要内容，采用回忆录的形式，于同年秋命笔。

原先打算只写在延边农村的经历，在那里的劳动、生活与见闻，内容相对集中一些，题



材不加扩展。后来觉得只记长白山农村那一段未免失之单调，局限性大。因为干部下放农村劳动，脱离不开当时的大环境、大气候，下放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然发生的事情。大批干部缘何携家带口到农村去走“五七”道路？作为广大下放干部中特殊一员的我们夫妇，在下放的几年中又处于什么样一种特殊环境？起因何在？结局又是什么？不回答这些问题，故事就将失去完整性，许多问题就交待不清楚，读者也无从全面了解主人公的整体情况。

因此，便决定此书以下放农村为主线，同时包括下放前后作者从获罪到平反的全过程，真实、连贯地加以记述，以期通过我们夫妇的遭遇，去反映一个时代的侧面，包含了作者二十几年的亲身经历、真实感受和深刻反思，既热情讴歌真理，又无情鞭笞谬误。这样，可能会给知情与不知情的读者以兴趣和思索——如果《火红的金达莱》还有些许趣味性的话。

我将那段历史过程中遇事有感而发写的一些诗也收入书中，我想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形势和作者心情，使作品更加真实生动。这些诗水平虽低，甚至不合韵律，但感情是真挚的，诗言志嘛，故相信广大读者不致苛求。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热心作序的王火、杨宇心同志、襄助出版的宁俊达先生和付出辛劳的天地出版社致以深深的谢意！

衷心欢迎读者对拙作提出批评。

作者 2002 年 3 月于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火红的金达莱：文革中下放延边农村纪事 / 帅雪晓
著 . — 成都：天地出版社，2002.6

ISBN 7-80624-577-4

I. 火... II. 帅... III. 帅雪晓 - 回忆录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3572 号

责任编辑 吴晓春
封面设计 邱云松
技术设计 杨 潮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印 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规 格 850mm×1168mm 1/32
印张 6 字数 93 千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2.00 元

火红的金达莱

——“文革”中下放延边农村纪事

帅雪晓 著



ISBN 7-80624-577-4



9 787806 245774 >

ISBN 7-80624-577-4/K · 20

定价：12.00元